

3 1761 08043533 2

海外述林

AN ASIAN-CANADIENS MAGAZINE

第一卷第五期 (總第五期)

THE CROSSROADS

Vol. 1 No. 5



余柏泥

097.1

no.5
77:[May]
ADA_HK



海外述林目錄

第一卷第五期(總第五期)

Vol. 1 No. 5 1977

加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3	方資求整理	「海外華人認同問題」座談會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7	李安納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北美洲的華人	A look at North American Chinese from a psychological angle
10	弼馬溫	從於梨華的小說來看海外知識份子的心與貌	A look at the state of mind of overseas Chinese from the novels of Yu Li-wah ()
12	本刊	關於海外華人心態的一項調查	A survey on the mentality of overseas Chinese
14	于天	魁北克——語文白皮書——加拿大	Quebec - The White Paper - Canada
15	梁啟超	北美洲華僑史(長篇連載之五)	History of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fifth in a series)
16	何濤生	民生與經濟(長篇連載之五)	Economics and livelihood (fifth in series)
19	柳亞子	我的兒童教育觀	My views on Child's education
20		四度時空:	Four Dimensions:
	金帛	死亡	Death
	學永	真理的寶藏——一個故事	A treasure of truth
	志華	吳姆	Mother Ng
21	二丁	決不糊塗地過此一生	Waste no life
22	集思	中國工人福利簡介	Introducing some social benefits for Chinese workers
23	李落	獻給為人母者	Dedicated to the mothers
25	香港・李萬	陶朱公(中/電視劇本)	To Chu Kung
32		編者的話	From the editor

33 Editorial

AN ANNOUNCEMENT TO OUR READERS

34 ON THE EDUCATION CRISIS

36 THE JAPANESE CANADIAN CENTENNIAL

37 China and Christian

42 Poetry

43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CANADIAN MOSAIC

「海外華人認同問題」座談會

「海外華人認同問題」座談會

主辦：多倫多華人協進會
海外述林出版社

主席：孔慶溢
出席：方資求 何偉能 何灝生 吳溫溫
岑建勳 梁志華 梁雪芬 陳志宏
陳錦祥 黃一鳳 崔啟元 郭礎銘
饒永進 關玉慈 梅美田 李懷敏

日期：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九日
地點：嘉蘭中心
整理：方資求



編輯按：相信大家都熟悉這樣的一個寓言：走獸跟鳥類開戰，一隻蝙蝠看見鳥類戰勝，就認自己是鳥類，後來戰況轉變，獸類佔了上風，於是蝙蝠背叛鳥類，認自己是獸類。這個故事中的蝙蝠是個投機份子，視乎那一邊對自己有利來決定自己的身份。如果蝙蝠不是個投機份子，反省一下，却分不出自己應該屬鳥類抑還是獸類，那末，就有所謂「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的產生。這裏所涉及的「認同問題」，正是我們海外華人的一個切身問題。

今年三月中，華人協進會及海外述林編委會聯合舉辦了一個座談會，邀請了數位朋友一起討論海外華人的「認同問題」，歷時約四小時。結束時不少人希望同樣的討論以後能更廣泛地推展。由於照原錄音帶整理的文稿過長，我們徵得了大多數與會者的同意，大量刪節，以便一期刊完，

梅：大多數亞洲人來了北美以後，形成了「內在集團」（Internal colony）。本來，人的思想受外在的社會環境所支配和溶合，但我們的反應却是抵抗這種潮流和自保。我們這一輩在北美洲出生的人，甚至已經有了三、四代，在這裏的身份仍然覺得很困難，不能夠像其他歐陸來人一樣，溶化在這個北美洲的文化主流中。生活在北美洲，但無論是文化上，甚至找朋友，找工作，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困難。「認同」的問題，對我們來說，甚至比你們那些剛從香港來的人還嚴重。

郭：文化可以指個人的日常生活，但從較高層面來看，例如著書立說，則北美洲的華人並沒有一個文化集團，而祇有一個種族集團。

饒：大多數人來的時候祇是爲了生活，例如由香港到這裏來求學的，大致上當初沒有加入這個社會的打算，因此始終有一種抗拒投入這個社會的意向。我認識另一些人早已決定加入這社會，而且積極地投入，如商人等。

生：每個人到了一個新地方都要學習適應新環境。至於「認同問題」本來並不存在，除非是受到別人非議。例如華人在加拿大，如果他認自己是中國人，而別人却質問他，說他既是加籍公民，爲什麼還叫自己做中國人呢？這才產生了「認同」的問題。又例如一個土生華人，幼時在相安無事的朋友之間，不會有認同的問題，到他長大，接觸到社會時，有人認爲他是中國人而強加這觀念在他身上，亦會有「認同」的問題產生。我的見解是：要消除「認同」的問題，應當聽其自然，讓每個人自己作出選擇，不必強加自己的價值觀於別人身上。關於文化的問題，是否中國文化跟美洲文化截然不同？我覺得不是。人類的文化是一個連續體，並非黑白分明，同時有不同和共通之處，因此，我們不應說「認同」某一種東西才是正確，無論「認同」什麼，都應該以自己的喜好及環境來決定，而不是由別人加諸於身上。我們不應該說應該「認同」什麼，認同不應有「是非之分」。

孔：我想提出一個問題，海外華人是怎樣定義的呢？我認爲主要是分兩層次，一是血緣上，一是文化傳統。我們從香港或台灣來的人，多少有中國文化的根基，至於土生在加拿大的，完全接受了當地的文化，可說是沒有「認同」的問題了罷？也不見得，正如剛才梅美田指出，在這裏的第二、三代的移民，社會上人們亦將他們當中國人看待，因此，即使他們有意同化於當地社會，但不爲當地社會所接納，亦會有「認同」的問題。

崔：剛才有人將「認同」一詞當作爲我們「認同」於加拿大人，而你（孔慶溢）所說的有兩層意思在內，一層是我們「認同」於加拿大文化，另一層加拿大文化「認許」我們。

宏：社會環境像是一面鏡子，要認識自己，往往是通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由此得到一個「自像」（Self-image），如果我們認自己是加拿大人，而別人總把我們當作中國人，即社會上部份人對自己的看法跟自己已有的「自像」不同時，就會產生「認同危機」。說到文化，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價值觀（Values），看看這裏老一輩華僑，或者是這裏長大的第二代，

他們待人接物的方式，跟我們有很大的分別，例如通常中國人有先苦後甜的心理，而土生的青年多數沒有這種想法。另一個例子是土生的一代比較開放些，要是投資做生意，他們肯大刀濶斧地幹，不像我們那末拘謹。說到政治，他們比較大胆和活躍，敢於批評政府。我們新移民到了這裏來，逐漸栽培了一種「子文化」(Subculture)，跟其他的有很大的分別。

岑：我同意何灝生的說法，但覺得他有忽畧之處。本來，由於膚色，習慣，傳統等等的不同，造成文化上的分別，不應釀成「人為的困擾」，但是，我們說「認同」仍是一個問題。某一種膚色或習慣，受到其他人厭惡時，也會產生「認同危機」。我們這些所謂「少數民族」，能否溶化到加拿大的社會而不受排斥，是「認同」上的一個大問題。在日本，移民政策是不讓其他國家來的移民入籍，即使祖孫三代都在日本，亦持原來國家的護照，但我跟那邊的一些中國人談過，他們根本沒有「認同」的問題，他們亦不會受社會所割離，沒有「隔閡」(Alienated)的感覺，而我們為什麼反為有「認同」的問題呢，我認為我們要具體地講，不是光說說定義。至於剛才提及的「子文化」(Subculture)，是相當難定義的，例如我們從香港來的中國人，跟在多倫多大學就讀的直接由中國大陸來的交換生，在生活習慣，意識形態等等方面，有很大的分別。誰能說我們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從台灣來的，又很大不同了。但外國人却往往「一視同仁，彼此不分」，祇要是黃臉孔的便說是中國人。

祥：我認為「認同」一詞是很有疑問的。什麼是「認同」呢？「認同」應該跟文化割開，例如說，如果我們在中國生活，而說我們「認同」於中國文化，那是荒謬絕倫。我們生活在加拿大，本身的文化是加拿大文化的一部份，因此，與其說要「認同」一個文化，不如說創造一個文化。我們要在自己原有文化的基礎上，同其他種族人士一起創造出新的文化。加拿大文化是由多種文化溶合起來，在創造一個新文化之中，我們可以溶合其他的文化。

郭：說到認同，我不想用「文化」這個措辭。我贊同剛才岑建勳的說法，那是「身份」問題。我們參與社會上政治，文化，經濟的活動，跟社會主流有不同的地方，產生出緊張的局面(Tension)是身份問題而不是文化問題。即使你在這裏土生土長，思想習慣等各方面都接受了這裏的教育，但仍存有「認同問題」，因為社會對待你，跟你自己所認為的身份不同，在你參與社會活動時遭到了阻力，才使你體驗到問題的存在。所謂「認同」，是在兼有「相同」和「不同」的情形下產生，例如幾年前海外掀起「認同中國」的運動，可謂如火如荼，引起這個運動是一方面感到自己有中國人的血統，另一方面因為自己並不在中國生活，跟中國整體人民割離；認識到自己跟中國人有「相同」之處而要消除「不同」之處時，就引起部份人返中國大陸的想法。另有一部份人「認同」加拿大社會，「相同」之處是跟加拿大人在同一塊土地上生活，「不同」之處在於自己屬少數民族，在社會上往往較吃虧。有人打算在加拿大立足生根，不當自己做中國人，也是想拋棄自己跟當地「不同」的地方。以上兩種「認同」方式屬於兩個極端，至於能否將自己當作又是中國人又是加拿大人呢？許多人心想「魚與熊掌，兩者兼得」，但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很矛盾，我跟許多人接觸過，知道他們都有這種想法。這是「認同問題」解決方式

之一，但似乎不易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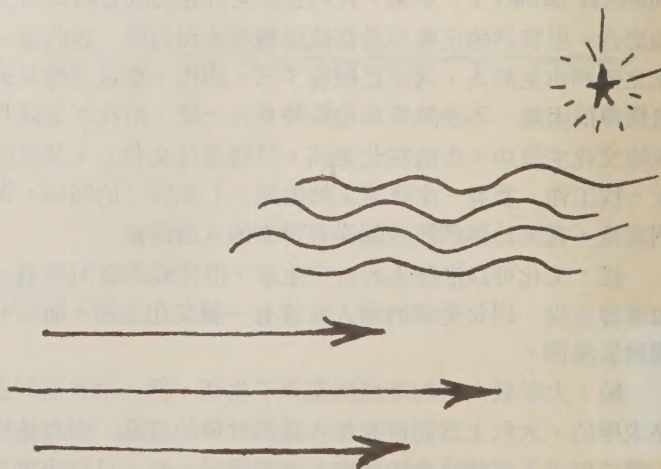
岑：即使中國人想全心全意做加拿大人，也可能是自己的一廂情願，不為當地人接受，這是因為社會制度，政策所引起的「人為困擾」。不少父母恐怕子女將來對中國事物完全生疏，強迫執行中文教育，造成子女在社會上的畏縮心理，亦是一種在家庭裏施行的錯誤政策引起的不良後果。

宏：剛才我說到的價值觀是我們跟加拿大人的重要分別之一。另一個造成分離的是「形象塑造」(Stereotyping)，導致了許多加拿大人不把我們看作是社會上的一份子。中國文化作為一種「子文化」，不能跟加拿大文化的主流分庭抗禮，祇能作為一種附屬的地位。我們自己不被當作加拿大的主人翁，因此我們很難認自己是加拿大人。要打破這邏輯上的惡性循環(Cycle)，這種「形象塑造」須予「致命一擊」。若能做到這點，加拿大人會接受我們作為「同胞」，正如自己所希望的一樣，就沒有「認同」上的問題了。

能：剛才說到「認同」的問題，各位忽畧了一點，就是意識形態。無可否認，前幾年許多人參予認同中國的運動，這是因為，中國人傳統的意識形態是艱苦奮鬥，中國人亦一直將它作為美德。到了海外的中國人，感覺到受排擠，而目前中國制度對窮人特別照顧，因此會想到中國的好處。

方：我不知道今晚我們討論的「認同問題」到底是當作羣衆心理現象來研究還是當自己個人的問題來處理？作為一個個人的問題，我們也有很多值得討論的材料。假如你「認同」了加拿大，偶經香港，見了親屬或朋友，你會否稱加拿大是「敵國」(My Country)而中國說是「貴國」呢？又如果有人將你當中國人，你會不會馬上糾正，堅持說自己是加拿大人，不理是否會引起別人的反感？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的「認同」經不起類似的考驗，是否等於一種「權宜之計」或「投合心理」？社會固然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自己的形象(Self-image)，但是，「認同」是否社會環境的函數，一種沒有原則性的表現，旨在避免痛苦或獲得安全感？

能：我繼續補充自己剛才說的。我認為「認同」是須要的，但反對「回歸」的作法。「認同」祇要通過認識，就可以在這社會上做更多好事，改善這個社會。許多人以為「認同」導致了「回歸」，我看是不必要的。



梅：我同意岑建勳及陳錦祥的說法。要說到「認同」的問題，就要返到社會制度，政策等等問題。例如「回歸」這問題已有長久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早期赴北美的中華人。為什麼他們想到這裏來賺了錢然後返中國呢？並不單是他們對中國有依戀的心理，主要是由於在這裏他們受到排擠；他們到了這裏來，不准購買土地或通婚；我們須要討論一下，是那種社會條件引起他們恐懼而想返回祖家？為什麼從西歐來的移民又沒有這些心理呢？說到「認同」或「同化」問題，歸根還要說到制度、政策。現在我們要得公民權，對移民來說是沒有困難的，因此我們想到的應該是怎樣對加拿大文化有貢獻，這一定要從中國文化中去汲取。其實加拿大本身在文化上不見得有特別的成就，同時，我感到這裏的華人對北美洲文化作出的貢獻，目前實在太少了。早期華人來美，為生活而勞碌，沒有剩餘時間精力做文化上的建設，現在我們的條件比過去優厚，因此應負起這種文化上的工作。

孔：的確，我們一代比起早期華人享有更多的人權，當然，許多人權是過往的努力爭取而來。我們「認同」於加拿大，就應該多多投入這個社會，但並不一定要「同化」，我們可以「認同」中國，但並不一定要回中國去服務；在華人社會裏，許多人有這種想法。如果社會上的問題造成了「認同」的問題，那末我們也要研究一下，華人是否對自己製造了障礙，固步自封，不投入社會呢？

生：正如我剛才所說，「認同」是一個沒有「是非之分」的選擇，純粹是個人在不同環境下的傾向。而且，對一個人既有的認同方向進行挑戰可以引起認同危機的產生。對於自己的認同受到挑戰，如果能看清楚那不是因為自己認同了一個錯誤的對象而是外間的壓力時，就可以心安理得。但是，既然在加拿大居住，無論「認同」什麼，都應該積極投入這社會。「認同」本身是個感性問題，不是理性問題，我們不應認它妨礙我們投入這個社會。

李：從文化的層面上說，認同的問題發生在本地文化與外來文化互相能否融合的契機裏。但是在這個國度，甚麼是本地文化、甚麼是外來文化呢？唯一具有歷史性的本地文化是印第安人的文化，餘者皆來自外地。因此大家不妨考慮下列三點，①加拿大為多元文化的社會，自然包括我們民族所屬的一元在內，華人在社會上應該有個「合法」的地位，原則上不會受社會的排斥；②如果社會中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互相尊重另一民族的文化，不會造成某一種文化比另一種文化更優越的歪曲觀念，「認同」本身就沒有困擾，③「加拿大文化」未有確切的定義，如果我們不明確它就「認同」，那末是一種自欺欺人的作為。基於這三點理由，我們無須被「認同問題」所困惑。當我們說到認同時，就是懷疑自己，對自己失却信心的表現，即恐怕自己不能成為社會的一員，就強調「認同」來肯定自己。祇要自己對社會有貢獻就不受認同問題的困擾。

宏：我不同意這說法。我有一位讀工程的朋友在實習時，同一組幾位加拿大學生不理他，簡直當他不存在。「認同」是個人的選擇，但這種選擇往往不順利，有「認同危機」的發生，即使入了籍後也不得解決。理論上加拿大是多元文化，但「多元文化」這口號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可能祇是用來裝璜一下門楣。

方：剛才何灝生說認同本身不應該有「是非」的道德眼光，我不反對這點，祇是有點保留。至於他說到應該投入社會，我弄不明白為什麼這裏又引入了道德標準。假如說我不喜歡跟這世俗同流合污，也可以心安理得。我曾提到蝙蝠的寓言，觸發我提出一個問題：「認同」是否要看那一邊對我們有利而定呢？我們可以像錢鍾書先生所說的那樣把故事顛倒來講，蝙蝠在獸類前說自己是飛鳥，「高高在上」，碰上鳥類時却說自己是獸類，表示「腳踏實實」了。把自己當作Chinese-Canadian，亦會有這種可恥的傾向：在新移民面前說自己是加拿大人，「高你一等」，在加拿大人面前說自己是中國人，沾一下中國人的光或賣弄一下中國的事物。因此認同不是絕對沒有「是非之分」的。

生：說到投入社會，並不是我在道德上的判斷（Moral Judgement），我這樣說是根據一個客觀事實：如果我們不投入，就不能爭取到自己應有的利益，也不能盡社會對自己要求的義務。這樣，我們就會被社會所摒棄。

岑：我不同意李懷敏的看法，「認同」問題對他來說不存在，很可能是個例外。我同意郭礎銘的說法，「認同」是社會性的問題。我們今天談了這許多，也不及在Canadian Magazine上出現的「A Chinaman's Chance」給人對華人的印象所能抵消的萬一，因此，這不由我們對個人的「認同問題」解決而解決。民族之間的疆界劃分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孽子」，文化和生活上的不同，我們不能也不必施加壓力使它們融和。

李：如果有人說我剛才講的一套是理想主義，我無意替自己辯護。我亦看到在加拿大有歧視的情形。但在中國人的社會中亦有同樣的情形，例如狹隘的地方觀念。這種情形為什麼不會使中國弄分裂呢？那是因為中國歷史長遠，像個大熔爐一樣。這種理論加上社會進化論，曾經在美國提出過，但行不通。因此大熔爐應該是各種文化兼容並包，不是獨樹一幟，祇要通過教育，培養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互相尊重及忍容，是可以達到「大同」的世界。

梅：種族歧視怎樣產生，最好，回溯一下歷史。亞洲人在百年前到北美來，提供了開墾北美的勞力。在移民的過程上，先是北歐人來，然後是南歐，後來又放寬亞洲人和黑人。東印度(East Indians)是最後的一部份，因此是目前最受歧視的有色人種。至於歧視產生的近因，跟經濟有很大關係。歷史上的華人被認為搶走了當地人的工作而受歧視。愛爾蘭的伐木工人將溫哥華整條唐人街燒了，這種行為受政府所縱容(Condone)。種族歧視對政府有利，必要時政府會推波助瀾，有組織有計劃的(Institutionalized)進行。因此我們不能太過理想化，遇上這種情形應該用政治的途徑去解決。

饒：我覺得何灝生跟李懷敏的說法太理想，也許我們要看些實際點的情形。我們假想一個學生來了加拿大讀書，後來轉了做移民，進而歸化做公民。在這過程中，他作了幾個抉擇與轉變。當初來加，並沒有久留之意，祇不過感到來加拿大讀書較理想。讀完書第一個選擇是移民，即「三等公民」，這步表示自己跟加拿大有默契，一方面容許在加拿大生活工作，另一方面向政府納稅，可以說是「互相利用」。最後一步是入籍，那時「認同危機」的情形是勢所難免。一方面，入了加籍後有很多好處，另一方面得把自己人算做加拿大人，並不太甘心。尤其是宣誓效忠英女皇，心中是老大的一個疙瘩。如果是這裏出世，就是加拿大人，不用宣誓，但在情感上，即使到了老惑

之年，我仍不能當自己完全是個加拿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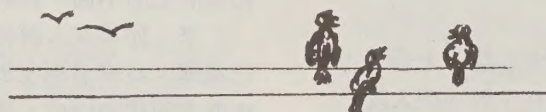
李：剛才梅美田說北歐的移民先到，在政治上經濟上掌握了實權後讓南歐人來，然後再讓亞洲人來。當他們讓一些「非我族類」的人來時，有經濟上的目的，譬如英格蘭人讓愛爾蘭人來開墾，後來城市有了規模，又讓意大利人來建築，華人來做服務性的工作。在一九五〇至六〇之間，華人到加拿大來有所謂「入境地位」(Entrance Status)，也就是一踏足入加拿大幹的是那行，以後便一直是那行。現在的華人比東印度人早來，社會地位也比較高，因此可能造成有權利去歧視東印度人的錯覺，正如早年愛爾蘭人遭英格蘭人歧視一樣。華人被本地社會接納後，即是說認同的問題解決了，或多或少得要受本地的價值觀念影響，若不採取原則性的揚棄，很容易便起了看輕或排斥別一民族的心理。這是亟亟急欲解決認同問題的人值得注意的問題。

方：大家講了這末多，我感到不如像饒永進說的那樣，講得具體點，我認為入籍宣誓時產生心理上的矛盾，是個很好的具體例子。我另有一個涉及「認同」的具體情形：我們說到一些土生土長，不懂得中文，不認識中國事物的人，在香港稱之為「竹昇」或「ABC」。他們不當自己作中國人，而我們又藉着這點來揶揄他們，我們對他們這種態度是否算得上一種歧視？我們在交談中，說到「竹昇」，大家心裏好像不會感到不

舒服，像是未得罪過任何人似的，是否應該有人指出，加以糾正呢？對第二代的看法，我不同意在座幾位說的對孩子不可以強迫他的識中文。孩子因為年紀小，還未有清晰的價值觀，身上有中國人的血統，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應該讓他們早點知道。在未成年之前，父母應負責，而不是毫無原則，由他們自己歡喜去自由發展。不然到他們長大了，有了價值觀了，可能很後悔自己不識得中文。別人都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却不懂得中文，亦會引起「認同危機」。

宏：我同意何灤生的說法，「認同」是個人的問題，但我感到兼有感性和理性兩方面。例如效忠英女皇，在感情上不能容納，但入了加籍後，有資格申請做公務員等權利，不是在實際上有得益嗎？提到第二、第三代，我想說一下移民綠皮報告書，這份報告書中，移民犧牲最大，移民到了加拿大後，差不多是人力儲庫(Human Stock)，他們來了後，受到社會的影響，在意識上、思想上有了一種模式，很難回老家去，除非有很大的決心。因此移民來了加拿大，不單貢獻了自己，連自己的子孫也貢獻了出來。

郭：我們認為「認同」是個人的選擇，但我們不可忽略，那也是羣體現象。為什麼大家都感到有這種情形，而不是個別有一兩個人有「認同危機」，因此一定有社會成因。「認同問題」不單是個人解決與否，羣體也須要解決。(下署)★



大中華貿易公司

經銷：

國產地道藥材，祖國，香港成藥，
專人負責配藥，歡迎外埠郵購。

靈芝蜂王精
至寶三鞭精
參芪蜂王精
雙歸寶素精
當乳片漿
蜂乳片漿
北蟾片漿
蛤蚧片漿
鹿尾羆精

Great China Trading Co.

121 Dundas St. West

Toronto

416-368-1242

Mailing Address Box 5181 Stn. "A"

Toronto, Ont.

中國商業貿易公司

祖國工藝品

籐，竹，柳，草，製品

專營批發

送貨快捷

歡迎同業代理 現貨大量供應

China Commerce Trading Co.

860-862 Richmond St. West

Toronto, Ont.

416-869-0645

Mailing Address Box 50 Stn. "A"

Toronto, Ont. Canada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北美洲的華人

。李安納。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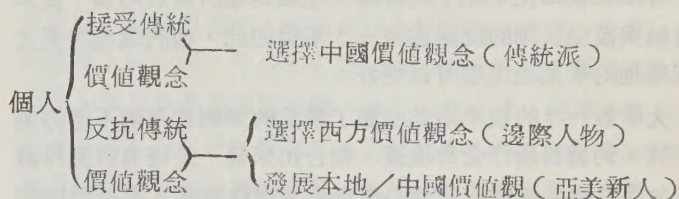
心理學者認為生活在北美洲的華人，必須具有很大的「自我」力，才可以在這個充滿各種矛盾的社會裏生存下去。他得在上一代仍然堅持保有的傳統教育方法、東西方社會不同的價值體系和道德觀念、種族歧視和調和等問題的衝刺下，尋求新的平衡點。出生於傳統保守派的華人家庭裏，長輩有着無上的統御權威，享有不容挑戰的崇高地位。近親家庭間有着比血緣關係要求得更密切的聯系，長房的家族對其它各房的宗族成員有着嚴緊的影響或控制。宗族着重名譽的觀念，直接或間接地要求年青的一代聽命，好好地，在學業上尋找出路，以便將來在社會上做出光宗耀祖的事，使家族的門楣顯赫。倘若子侄做出任何反倫常、叛逆的行為，將被視為家門的不幸，禍延全族的羞辱事件。為了箝制下一代的思想行為，保守的上一代不惜使出種種花樣，趕出家門有之，諄諄訓誨有之，亦有使出軟硬兼施的手段，而最成功的手法還是採用心理戰畧，使年輕的一代在做出「越軌」的行為時，產生罪惡感，達到嚇阻的效果。許多時候，心灰意冷的父母絕望地對違意的兒女說：「你怎樣可以這樣對待雙親的！」又或是：「我們犧牲了一切，日捱夜捱都是為了你的好，你還是那樣不長進。」

一九六六年，狄福士(Devos)和雅保特(Abbott)在研究三藩市的華人家庭狀況的時候，概括了他們的研究，結果如下：

- ①華人重視子女們的教育成就高於其它一切
- ②對於權勢，一般華人的反應是被動的
- ③尊重耆老，就如尊重權勢一樣
- ④對親戚抱有強烈的責任感
- ⑤幼者不能完成長者的期望時，容易產生自怨
- ⑥養成兒童正常社交習慣的適當方法是消除肉體上的暴力和懲罰

除了家庭背境的影响，生活在北美洲的華人也同時受到當地文物的薰陶。北美洲長大的華裔土生，在學校教育和大眾媒介的感染下，不斷地受到西方價值的衝擊。這些價值體系反映了當地社會的一般態度、規範、感情表達方法與及其它的行為表現。交遊同輩的影响，取代了長輩的權威；無可避免地土生華裔在各方面一定有所改變，怎樣適應和迎合社會大多數人的看法比血緣的問題更需要有所抉擇。一九六九年，美國一位華裔社會學者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上發表了向三百三十六名華裔大專學生的研究報告時指出，華人越是與北美洲的價值標準接觸，越是被這些規範影响；華人在北美洲有了兩代或以上歷史，不受當地文化同化的很少。

從心理學和認同的角度看，北美洲的華人大概可被劃分為三類，用圖表來解釋即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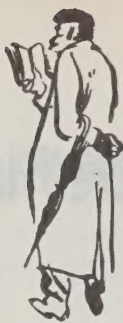
傳統派



此類華人有着強烈的、內涵的中國價值觀。他們努力使自己成為好兒女，忠於家庭，侍奉父母至孝，而把父親和丈夫的義務放在次要的地位。傳統派華人把學位和職業看得很重，是個人成就和自信的基磐。事業上的成功，使傳統派覺得自己被社會的人尊重，因而替家門帶來聲譽，能夠光耀門楣。由於社會的不平等，傳統派華人必須加倍努力，才得以晉身白人眼中的所謂成功階層；倘若一旦過度拚命，此輩又被揶揄為「華籍猶太人」。

心理學家認為傳統派的性格衝突根源於兩方面。努力使自己成為好兒女，對上一代的命令言聽計從，連懷疑的眼色也不敢稍為顯露一下；在社會的階梯上爬升，不遺餘力地使自己成為成功的人物，這些以羣體標準為標準的自信心態，亦正是產生心理衝突的首要根源。他們一旦發現父母對自己的期望過高，又或者不應有這些期望的時候，這些在中國傳統價值觀念薰治中長大的人會產生怎樣的心緒呢？最基本的心理反應是對個人的感受與上一代的期望出現矛盾。向上一代的願望低頭，使得把自己不滿的情緒壓抑下去；否定上一代替自己安排前途的做法，却替他帶來罪惡和羞辱感。由於認同家庭的感情濃厚，傳統派認為自己應該對不遵從上一代之命或未能在事業上取得成就而負責。養成順從前輩的先入為主觀念，傳統派不願譴責上一代。另一方面，由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祇要肯拚命，機會還是有」；因此，他們也不會將失敗歸咎於社會，而自怨是唯一的負責者。

傳統派的典型



三藩市出生的亞星，今年二十歲，是電機工程的低年級大學生，父親現年五十八歲，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靠經營雜貨店為生，母親則是一位家庭主婦。亞星是五兄弟中最大的一個，雙親對老大的期望頗高，不斷地提醒兒子他們對他的期望，要亞星將來成為一位工程師。

在整個早期求學的階段，亞星的成績表現出色，屢受師長的讚賞；他用功勤奮，聽老師的訓導，永遠是一個標準的好學生。可是雙親卻把他兒子的優越表現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從來沒有給與孩兒鼓勵的說話和眼光；不但如此，他們還埋怨老大，認為他的學業表現還可以更好。

大學第一年的後半期亞星患了嚴重的頭刺和身體不適的無名病痛，到醫務所作全身檢查，報告出來後，並沒有發覺身體機能欠妥之處。最後被送到心理治療家處作觀察。在接受問病的期間，亞星屢次表示耿耿於未能滿足雙親的期望，經過心理治療家進一步的探求，發現亞星心理上的矛盾很大。首先，他在學校的成績越來越壞，感到對不住父母。其次，亞星自己的願望是當劃則師，但雙親卻不能夠接受這種職業。最後的壓力來自家庭的經濟狀況，家裏希望亞星早日畢業，找份入息不錯的工作，以減輕父親肩上的經濟重擔。在病痛未曾發作的前一段時間，雙親不斷地在老大面前說：「你畢業後，有了錢便可幫補弟妹們完成大學的費用」。對於這些強行的責任，亞星最初的反應是盡量壓抑抗拒的情緒；當憤怒的情緒能夠假設地爆發在上一代的身上的時候，身體的不適也就隨之而煙消雲散。可是，回復到自己真正的意向，情緒陷落極度低下的境地，罪惡感隨即衍生，認為上一代既然養育了自己一生，自己有什麼理由去憎恨他們呢？

除了家庭，傳統派與外面世界周旋時遇到的困擾，是他們產生心理矛盾的第二因素。儘管傳統派設法把自己的生活範圍局限於唐人街的次文化（中國文化在北美洲文化土壤上衍生出來，有別於中國本土文化和北美洲文化的一種生活模式）的圈子內，他們還是沒法子可以與白人社會全然隔離起來。長久受慣了聽命和順從教育，在應付日常的事務，傳統派也是採取同樣的態度。在家庭中，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和該負的責任早已由上一代界定，後輩不能提出任何異議，傳統派早亦接受這種安排；因此，在不同的價值觀下，是很難與當地社會聯在一起。

邊際人物 (Marginal man)



與傳統派有異，邊際人物不斷質詢上一代的傳統價值觀念。他們接受西方文化，並且努力使自己成為這個體系裏的一份子

。在東、西方兩種絕然不同的文化範疇的夾縫裏，他們經驗到文化認同帶來的痛苦。在嘗試去掉這種痛苦的途徑中，他可能全部拼棄中國的事物，往往表現得更為西化。邊際人物的生活自信，要看白人接納他們的程度而定。在男孩子方面，白人朋友的多寡，說英語時有沒有鄉音，被認為是他們能否被白人社會接納的指標。

邊際人物的心理衝突也相當厲害；敵視和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化可能導致敵意的內轉，產生所謂種族自怨的心態。種族自怨可能以暴力或憎恨自己人作為發洩的形式出現。社會心理學家認為目前邊際人物在北美洲的華人社區內沒有實施暴力來解決內心的矛盾，是由於新的、本土的和西方文化揉合下產生出來的次文化影響所致。次文化的價值觀念要求壓抑非理性的、破壞性的感情；向同胞施用暴力而產生的罪惡感也促使邊際人物不敢遽然下手。

邊際人物的過度西化行為，主要是由於他們抗拒上一代的價值觀念和中國文化的一種行動表現。邊際人物生着一副不能剝掉的黃皮膚，黑眼睛和扁平的鼻子，在牽涉到華人的取笑和輕視的言談時，也足以使此輩人士感到憂慮和產生心理矛盾；由於不能全然割離與華人的關係，隨之而來的自怨心理使形勢趨於更壞。邊際人物的心理鬥爭頗為劇烈；雙重性格做成的精神分裂，使他們的行為看來鬼祟，神經緊張，在社區內失掉安全的感覺。

邊際人物的自怨心理是由於雙重矛盾衝突的結果。首先，邊際人物憎恨自己生有中國人的性格和體形，討厭自己生得矮小，豬膽鼻，吊斜眼，缺乏西方男性的健碩身形。其次，由於自怨自艾，邊際人物對自己竟也憎恨起來。這些心理衝突並非憑空捏造，而是現實生活常有的。下面的一宗病例，說明了一切。

邊際人物的典型



譚珍納是一名廿一歲大的高年級社會系學生，在奧利根州的林崙市出生和長大，已是第三代的美籍華人，但在孩童時代，與當地華人社區的接觸很少。父親今年五十多歲，執業律師；母親則是一位四十來歲的家庭主婦。在三個孩子中，珍納的名位在中間，上有一位在醫學院就讀的長兄，下有一位十七歲的弟弟。

這個女孩子近來屢復感到自己的無用，做事不能集中，情緒低落，自殺的念頭時隱時現。精神上的困擾越來越嚴重，最後不得不到精神病醫療所去，接受醫生的診治。在問病的期間，連病人自己也不能夠告訴醫生心緒不寧的原因，倒是醫生觀察入微，看出病人對他抱有敵意，才找着病痛的根源。原來珍納不滿意受一位華籍精神病家診治，她懷疑這一安排並非巧合，而是因為自己是華人，院方故意讓一位華籍醫生前來診斷她的。珍納公開承認，任何提醒她的血統的事物，均可令她感到憤慨；對中國的傳統習俗和華籍男性抱着敵視的態度。

進一步的調查顯示，病人爲了甩掉華人的關係，一直以來祇是結交白人，不願與任何華人來往。在中學時代，珍納便不願父母們的反對，不斷地帶同白人異性回家。她埋怨自己生爲黃種人；並且把這種「缺陷」歸咎上一代，以結交白人作爲報復。

大學早期，珍納曾經先後愛上過兩位白人異性；不幸地，兩次際遇均十分短暫，不愉快地草草收場。最後的一次愛情波折，還是發生在到醫務所診治前的四個月；男家方面，以停止經濟支持爲脅，威迫這對異族情鴛分離，顯示非我族類是這次幸福生活觸礁的主要原因。

儘管意識上不是那般明確，珍納越來越難否定自己的民族血統。最后一次愛情的受挫，使她恍然大悟，自己到底還是華人，沒有全然地得到社會的接納。在抉擇期間，珍納起首仍是以強烈且尖刻的堅決態度否定自己生活裏的中國組成部份。稍後，這些敵視的情緒開始內在化，醞釀著自怨的心理。珍納開始面臨認同危機，一方面與自己民族在北美洲衍生出來的次文化疏離，一方面又未能全然地爲當地社會接受，認同危機的不能解決，產生了自卑無用感和情緒低落。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邊際人物一定也遇到個別的或體制上的種族歧視。舉例來說，異性朋友的父母，由於種族不同的緣故，反對與他們的兒女來往，這便使邊際人物面臨矛盾的抉擇；他渴望投入當地的社會，卻不爲所有的人接納。在嚐試解決這些矛盾的時候，邊際人物的行動往往表現得過火；對方父母反對自己與他們的兒女戀愛，被解釋爲個別的特殊例子，不能作爲反映種族歧視的普遍存在。雖然他明白此類情形一定也還會發生，但卻不能改變半點他渴望同化的意念；相反地，他會視白人異性爲「禁果」，加倍努力攫取，一旦成功，便認爲是被當地社會容納的表徵。邊際人物不相信種族歧視真的存在北美洲的社會裏，因爲若非如此，他得要承認，自己努力投入的世界，是一個種族不平等的世界。

邊際人物也不相信體制上的種族歧視確實流行在北美洲的社會裏。他們認爲華人不能夠打入高級行政人員的職業範圍，是因爲華人做事不夠決斷、保守的緣故。至於個人未能全然受當地社會接納，邊際人物並不把它看成種族歧視的普遍流行，反而認爲這是由於那些有着與自己相同血液的人死命擁抱着中國的傳統，習俗和價值觀念，他們認爲這些中國文化來到北美洲後，患上水土不服症，使華人看來更客外，更不爲當地社會容納。

亞美新人 (Asian-American)



這是一個頗新的名詞，表達能力遠不如前兩分類。目前，此輩華人的形成還是在前進的階段中，沒有任何定義足以把他們與前兩種分類的海外華人劃分開來。傳統派和邊際人物自有其它的人可以讓他們借鏡師法，使他們順利地把自己建立起來，而亞美新人卻可不是那般容易；他們在北美洲的歷史還淺，主要還是從六十年代中期以來，北美洲各地一連串的青年運動

派生出來的。新一代嚐試把自己從傳統與當前的生活條件中找出平衡點，訂立新的認同形式。他們看到愚孝的痛苦；民族自大則把創造力握殺損毀；種族歧視底普遍流行又非他們能夠接受。另一方面，亞美新人又與前兩類華人有雷同相似的地方。像傳統派的華人一樣，他們樂於與自己民族的人在一起，絲毫沒有厭惡的心理。在應付上一代的價值問題上，亞美新人又與邊際人物有着同感；即是說，未能全然接受上一代的價值體系。在塑造新的認同準則的時候，亞美新人採取揚棄的方法，以去蕪存菁的分類法對待中國文化。他們認爲對傳統文化貼伏，將局限個人的發展；上一代擁有決定下一代行爲的全權，則使新一代無法建立自信。上一代拼命側重社會的成就，做成崇尚物質的風氣；亞美新人的世界觀則把意義和自我放在首要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和社會意識比較上高漲，對影響他們認同的社會壓力較爲敏感。雖然其它類別的華人對這些壓力很少提出質疑，可是亞美新人卻極度關心社區內的貧窮、失業、個人或體制上的歧視、青少年犯罪問題等社會病徵。亞美新人認爲造成少數民族產生認同危機，錯在社會本身，而非少數民族，彼等因而致力改善社會制度。他們把提高民族的社會地位和民族自信放在爭取目標的首位，深信祇有透過集體的力量，當地社會對華人的形容才會大大地改觀。



亞美新人爲自己民族的社會地位而努力的同時，極力爭取其它亞洲裔的支持。因此，在北美洲，屬於亞美新人的一類華人喊出的口號是亞美新人 (Asian-American)，而非華美新人 (Chinese-American)。華裔，韓裔，日裔和菲律賓裔等人組成聯合陣線，僅非是爲了好在種族歧視的鬥爭行動裏方便行事，卻是出於這裏包含了一個積極的因素。

東方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太平洋西岸一帶的）有着許多相似的地方，亞美新人希望從這些多種雷同的文化中汲取其較有生氣的部份，移植到北美洲的文化土壤上，產生一種新的次文化和認同模式。他們不以先祖的文化爲恥；相反地，卻以文化的悠久而感到自豪而主動地去認識它。他們清楚地知道華人在北美洲祇是一個少數的民族；但與其它公民一樣，應該享有同樣的公民權利。他們的行動大大提高了華人在北美洲的社會地位，這是在他們的果敢行爲和不斷地對當地社會制度提出否定，懷疑和肯定的態度中完成的。★

海外知識份子的

心與貌

· 弼馬溫 ·



首先要聲明：本文並不是站在文學批評的角度去評論於梨華女士的小說價值，而是通過她的小說來看一些海外華人所處的環境，所面對的問題，以及心理狀態，精神面貌的一面。由於她筆下的人物以學者或學生為主，因此，我們討論的範圍亦限於知識份子。當然，小說中的故事或情節，可能屬於憑空虛構，如果是以真人真事為根據，亦有許多藝術上的加工，而且，作者亦免不了有主觀感情的加入。基於這些理由，有人會認為小說沒有客觀性，不能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資料根據。筆者不同意這種邏輯的結論。正因為故事可以虛構，作者可以較自由地發揮，把現實情況可以描述得更深刻，更無保留地反映出來，不怕得罪人，亦不會被人當作定論而誤會。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一書中，提及女孩子結婚是找一張長期飯票，如果這句話是作為一篇議論文斷語，會引起女性的氣憤。故事儘管是虛構，但也不會脫離現實生活，不然引不起讀者的共鳴。至於作者的主觀成份，當然要小心地加以區別，例如，於梨華女士把一個大男人寫成幼稚得可愛，一個孩子成熟解事得驚人，一個又不漂亮又不年輕的女人具有無可抗拒的魅力，等等，這種筆觸，跟所謂「女人心理」不無關係罷。又例如將一些讀文科的人寫得很有靈性（雖然鬱鬱不得志），而理科的學人寫得又驕奢又俗氣，連一個貪慕虛榮的女孩子亦看不上。這類主觀性無可厚非，但我們不能當作普遍事實的反映。總之，於梨華的小說擁有許多讀者，而反映海外留學生生活是她成功的因素之一，因此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吃馬鈴薯的日子」

要是說海外留學生和學人的各種經歷是苦樂參半，那末，於梨華女士反映的重點在「苦況」的方面，許多留學生都有一本唸不完的苦經，尤其是一面讀書，一面要做工賺錢來繳交學費和維持生活，可以說飽嚙人情之淡薄，久經身心之磨折。為了生活，為了前途，也得掙扎下去，捱苦受氣，委曲求全。

“……一到了夏天，就像是一條失了窩的狗，四處亂鑽，找個棲身之處，他現在記得那個夏天終於找到了事，每夜開運冰的大卡車來往於三藩市與卡美爾之間。像一節火車那麼長的卡車，從夜裏十二點開到清晨五時。世界在平安地熟睡時，他却絕望地醒着，睜着拉滿紅絲的眼，望着崎嶇的山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P. 34）

“（領班）到了廚下，對他繃了臉說：「不要把大學生這塊牌子帶到這裏來，在這裏，你僅僅是個侍者，記得！……」……當客人們吞嚥着食物的時候，他立在一旁吞嚥着酸水，

……沒有流出的眼淚。”（「又見棕櫚」P. 47）

“多少多少年前，有一個暑假；他在洛杉磯市做雜貨（掃帚、衣刷、肥皂等）推銷員，九十幾度的暑天，他拮据沉重的提箱沿門挨戶地兜售。……心裏很急，見又要被拒絕，只好硬着頭皮擠進門去，料不到那女人狠狠地將他一推，嘴裏說：「討厭的中國人！還不走……」他已經很累了，加上沒有提防到，所以連人帶箱，一起跌倒在滾燙的走道上。箱子裏的東西，一古腦的滾滿一地。……路上的行人停下腳好奇地看着他，孩子們拍着手笑着叫着，也看着他。看他半爬在地上，把貨物一樣樣的拾起來：女人的口紅，男人的修鬚刀，……。有一個小孩子叫道：「喂，你偷來的吧？」他……耐心地檢着別人的生活點綴品，他自己下學期的生活及學費。”（「變」P. 71）

二、苦出頭？

但是，畢業了，找到工作了，生活安定了，甚至結了婚，有了孩子，又怎樣呢？是否能一雪前恨，苦盡甘來呢？答案：並不見得。

“也許那些同學們在心裏羨慕他的衣錦榮歸，他的博士及他的成就。可是誰能猜測到這些是支付了他全部的青春活力去換來，而活力與夢想支付出去之後，雖然換來了只能給與安全而不能給與快樂的榮耀，而他所感覺到的只是一個空字？”（「又見棕櫚」P. 101）

“他想起第一次喝酒的情形，他剛剛考完博士學位的口試出來，……（系主任）熱烈的握住他的手說：「恭喜！恭喜！牟博士。」一聲「博士」所帶來的榮耀和得到所求的東西之後的滿足整個淹沒。他怔着，眼前晃過一個一個過去的自己。烈日下的果園、果園裏的自己、黃昏中的女廁、廁所裏的自己（他曾做過洗女廁的工作——筆者按），海邊的城市，城邊的餐館，餐館裏的自己，一個個的自己，為了達到博士目的的自己。……但是喜悅在那裏呢？他環顧四週，只覺心裏充塞着的僅是惶然，僅是空茫。……一杯又一杯的倒，大家都慶祝他，他也慶祝自己。不知是怎樣回到他的住處。記得的是他醒來時如何樣要把心挖出來一樣的嘔吐，吐了一地，吐在地上的月光裏。”（「又見棕櫚」P. 49及P. 50）

三、寂寞的煎熬

忙着工作或讀書時是痛苦的，但是一旦閒着沒事做，受到寂寞和空虛的侵襲，那種痛苦更可怕。對這種痛苦的描述，在於梨華的小說中不斷的出現。因此我們無法也無須較詳盡的列舉，祇摘引兩段來說明。

“在台灣讀大學時，最怕是忙。……出來之後，別的不怕，最怕是閒。既沒有地方去，屋子裏又呆不住。……他不喝酒，也沒有膽子去酒吧，也不好意思去有家的中國人處，又不願和其他單身中國同學在一起，因為那祇有大家窮聊，窮發牢騷，……不是他喜歡這樣毫無調劑的生活，而是他找不到任何調劑生活的辦法。”（「又見棕櫚」P. 90）

“這學期來了十幾個新的中國學生，顯得十分年輕，可是寂寞充滿了他們年青的面孔，因此，這些只有年輕而沒有青春的臉給人一種凜冽的感覺。……不再是為愛情而求伴侶，而是為了減輕自己的寂寞而尋。”（「變」P. 37）

四、沒點人情味

既然寂寞是那末的可怕，而有這樣多人受到寂寞的侵襲，那末，是否大家能互相安慰，或同病相憐？在外國，一個跟自己格格不相入的環境裏，遇上了同一血統、同一語言的人，是否有「他鄉遇故知」之感？往往沒有，人情味往往很淡薄。

“為什麼有的男女，為了一點點個人的偏激和狹窄的看法，不肯給予對方一些排除寂寞的力量？”（「又見棕櫚」P. 200）

“……現在這批學生那樣老腔，那種向外的樣子，他們給她很強烈的「難以接近」的感覺。”（「變」P. 205）

五、婚姻市場

人情味的淡薄，更表現在勢利和現實，尤其是婚姻，往往沒有一個愛情基礎，而像是一樁買賣。

“……在紐約的中國人圈子裏，有一種說法，女孩子們找對象，第一是醫生，第二是理工博士，最後才是其他。”（「又見棕櫚」P. 197）

“女孩子們，尤其是出國以後的女孩子們，把所有的夢想與崇高的愛情都摔到海洋裏了，找她們，先要有車，他沒有；要知道到那裏去玩，他不知道；要化錢，他沒有；要個可靠的前途，他前途茫茫；要有博士帽在望，他只有一頂果園老板送他的鴨舌帽。他什麼都沒有，於是什麼人也不敢去找。”（「又見棕櫚」P. 76）

用婚姻作為手段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或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於梨華在幾篇小說中都有揭露，可說是深惡而痛絕之。例如在短篇小說「交換」中的新娘的用心，簡直跟謀財害命無異，又在「二二三室的陳娉」直接地寫出了一個並不將婚姻建立在愛情上，而是為出國作踏腳石的女人。

六、沒根的一代

對於「海外的留生沒有根，像浮萍一樣隨水漂流」的說法，許多人耳熟能詳，其來源很可能是於梨華「再見棕櫚」的一段：

“Gertrude Stein 對海明威說你們是失落的一代，我們呢？我們這一代呢，就應該是沒根的一代了吧？是的，妳猜對了。我會回去（指回到美國去——筆者按）的，不全是為了爸媽。他們，尤其是媽，即使對我的不回去覺得失望，但是因為我是他們的兒子，他們慢慢會原諒我。也不是為了意珊，即使她因為我不回美國而不願和我結婚，我也許會失望，「但是，」他又重重的吸了兩口烟，把烟蒂壓死在烟灰缸裏，「我也不見得會很難過。我回去，還是為了我自己。在那裏雖然沒有根，但

是，我也習慣了，認了，又習慣了生活中帶那麼一點懷鄉的思念。同時，我發現，我比較習慣那邊的生活。最重要的我會有了一個快樂的希望，希望在每隔幾年可以回來，有了那麼樣一個希望，就可以遐想希望所帶來的各種快樂；像現在這樣，和妳對坐，聊聊心裏的話。”（「又見棕櫚」P. 176）

以上所形容的“無根”，基於“習慣了，認了”的理由，似乎是一種“惰性”，即是沒有意志力的表現。當然，很多人留學到外國，是以為比較容易實現自己的抱負，以及發展自己所長（尤其是想做研究工作的），而不是貪圖那邊的生活舒適與方便。無論如何，以上的一段文字是很值得體味的。

七、失落的一代

如果將“失落”解釋為無目的，或達到了目的後的“空虛”的感覺，那末，在於梨華的小說中，似乎比“無根”性有更詳盡的描述。

“一切都如此的機械化，在這個機械化的國家！為何而來？為何而來？她想大聲的問他們，可是她為什麼不先問自己？都不問吧，因為它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變」P. 37）

“出國的時候，抱着多大的希望，好像要在美國轟轟烈烈的做一番事業似的。我那時的志願，是要擠進美國的文壇。但是讀完了書，發現再不結婚就有做老處女的危險，於是忙忙的結了婚。結了婚之後，覺得該生個孩子，趕走——兩個人相對的空洞，於是忙忙的生了一個孩子，孩子生下來之後，起碼交給他五年的時間，五年，這五年裏自己的希望一個個破滅了，等到孩子上了學校，手上有一大堆空的時間，但是已沒有當作打天下的雄心，怎麼辦呢？祇好把自己的牢騷和希望用筆寫下來，好像洩恨，又好像找個事情做做。”（「又見棕櫚」P. 103）

八、陌生的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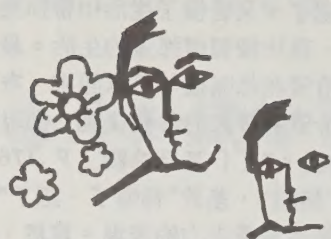
對“這一代”，以上提到了“無根的一代”及“失落的一代”，對下一代呢？在於梨華的小說中，有所謂“陌生的一代”。

“她站在尤琴尼的面前，想着安琪的將來，無法不承認這也是今日留學生的一大悲哀；因為他們的下一代生的是中國人的面孔，可以却實實在在不是中國人了。如果她自己屬於「失落的一代」，那末安琪、尤琴尼是不是該叫「陌生的一代」了呢？”（「變」P. 43）

“……我根本不知道她，她不是我的女兒，她是陌生人，我從來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她從來沒有愛過我，或把我放在心上，費利也沒有，他們都不是我的孩子，他們是美國人，而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忘不了中國的中國女人，……我有時寂寞得想把牆壁抓破，把窗簾撕爛，想把這些漂亮而不會說話的家具敲得粉碎，想把車子開到海裏去！……。”（「有一個春天」）

以上斷章取義地摘引了於梨華小說的幾段，作為透過她小說中的人物對海外知識份子的看法。如果我們對這個看法有同感，那末，我們也許會進一步感到目前在海外的中國文學中缺少的是浪漫文學，作為對“太現實”，“人情味淡薄”、“寂寞”、“空虛”、“買賣婚姻”等的一種反動，恰相反，庸俗的愛情故事以“文藝小說”的姿態充斥於書肆，更導向一種不健全的精神面貌。也許，這是一般知識份子在心態上的頹廢造成浪漫文學的疲態罷。★





關於海外華人心態 的一項調查

工作人員：海外述林編輯委員會
整理及分析：方資求

「海外華人的心態」是一個大題目。從空間而言，目前在世界上幾乎每個角落都有華人的踪跡，從時間而言，在我們上兩代已有大量華人移居海外；而「心態」一語又是包括多方面的。從深度與廣度來看，都顯出這個題目之大。這樣的一個大題目，若果祇是泛泛而論，則沒有什麼意思。為了較深入，較精確地研究，是須要進行詳細的調查。

進行全面的調查，當然大大的超出了我們的經濟能力和時間的許可。因此我們祇能從局部着手，希望得出局部的結果。縮窄了範圍，局限性大了，結果會可靠些。當然，我們對這樣的一個大題目不能作出任何定論，然而我們感到這步工作仍有其意義，至少我們了解到一些局部情形。至於能否向整體推廣而言之，我們不能作任何論斷，然而藉此我們可以發掘到一些整體上的問題。因此，我們所獲的資料，對整體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這次調查的對象是在多倫多大學就讀的華人子弟。我們在二月下旬分發了八十份不記名的問卷，收回三十份。由於收得的數量過少，我們又在三月中分發了六十份問卷，收回三十一份。發問卷的方式是：我們進入學校主要建築（如 Sidney-Smith, Robart Library 及 New College）的休息室，碰上有方便的中國學生，向他們畧解釋，要求他們合作填寫。不少人即時填寫；有些人利用校園內免費通訊的服務（Campus Mail），但這類問卷收回的較少。大致上，我們遇上的都是態度友善，願意充份地合作；我們的工作可以說是頗順利的。

這份問卷的設計，是提出幾個典型的問題，例如對「功夫片」，「新移民政策」及「四人幫」的意見。從答覆者對這些問題的觀點和態度，間接地瞭解到他們的趣味選擇，政治傾向，人生觀及價值觀等。我們不打算跟其他的「標準」問卷一樣，問一些喜歡看電影還是踢球，喜歡看那些雜誌之類的問題。因為那類問題祇能涉及一些個人的天性或傾向，不符合我們工作的目的。既然問卷的對象是大學生，我們亦問了一些跟將來或切身有關的問題。

以下是問卷的內容和某些結果：

問卷（作為「海外華人心態」某幾方面研究的抽樣調查）

性別： 年齡： 不記名

（一）以下對「功夫片」的各種意見，你是否贊同

贊同 不贊同 無意見

1、有相當高的娛樂成份。	20	33	8
2、內容有可取之處，如表現扶弱 鋤強，抱打不平的俠義精神。	30	17	14
3、使中國武術揚威海外，令外國人 刮目相看。	14	33	14
4、打開中國電影在海外的市場，是 中國電影史上光輝的一頁	14	31	16
5、多屬粗製濫造，不值一看。	41	9	11
6、以此向外國人自詡（針對3.）， 是阿Q式精神。	20	18	23
7、渲染暴力，對社會有不良影響。	42	8	11
8、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	16	15	30

（二）以下各項，你認為那一些在北美洲比較能夠真正地反映出中國文化？請選答三項或三項以上，並在方格上填上數字以表示主次。

有選填的 選填為1的

1、中國菜	32	8
2、功夫片	2	0
3、針灸麻醉	28	5
4、文物展覽	42	22
5、麻將	1	0
6、唐人街（指外貌予人的印象）	21	2
7、文化節或晚會	19	2
8、雜誌，報紙，書刊	17	2
9、關於中國的專題演講	27	6
10、英譯的中文書籍	19	3
11、其他（請標明）	2	0

（三）你個人的基本態度或人生觀。

很重要 重要 次要 不重要

1、努力工作或學習。	40	15	3	0
2、多結交朋友，提高 生活情趣。	23	24	9	2
3、關懷華人社會。	15	35	8	0
4、投入北美洲社會。	14	20	16	7
5、多認識中國。	25	24	8	1
6、婚姻、定居、固定工 作等。	15	25	13	6
7、找尋宗教的（或富宗 教意味的）歸宿。	5	15	15	24
8、講求生活享受	4	17	24	15

(四) 你對「四人幫」的意見或反應。(選出你認為最適當的兩項)

- 1、從新華社消息及駐中國的西方記者的報導可見「四人幫」確有篡黨奪權的陰謀。 7
- 2、提高了自己對一小撮反黨反人民的壞份子的警惕。 4
- 3、一些標榜中立的報紙雜誌肆機大造文章，混淆耳目。 6
- 4、證實中國數千年來「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道理。 13
- 5、是穩健派戰勝激進派的結果。 11
- 6、導致中共政權更頻於崩潰覆亡。 1
- 7、發生得太突然，不可思議，亦無從了解。 9
- 8、要研究清楚才能表示意見。 27
- 9、沒有興趣研究。 11
- 10、其他(請標明) 1

(五) 你對加拿大政府「管制移民」的政策看法(如果贊同，請標上「V」號)

- 1、任何政府首先要照顧到自己國家的利益，因此是無可厚非的。 39
- 2、政府企圖以管制移民的方式來解決經濟及人口分佈問題，是不切實際的。 21
- 3、政府忽視移民對社會的貢獻，而在實施管制時在有意或無意之間製造出一些對移民的不良印象(例如移民造成失業率高)，是應予反對的。 31
- 4、跟世界上很多面臨戰禍，饑荒，人口壓力等問題的國家比較，加拿大可說是得天獨厚，因此有繼續承擔移民的義務。 27
- 5、管制移民帶有種族主義的意味。 28
- 6、管制移民是政府在加拿大人輿論壓力下不得已的措施。 12
- 7、沒有意見。 3

(六) 你現在就讀於那個院系?

就讀年級: 1 2 3 4 5 研究院

如果你是準備入研究院的，則打算入那個院系?

(七) 你自己對將來前途的觀感。請答一項。

- 1、如果順順利利，相信是沒有問題的。 12
- 2、難以逆料，然而仍有信心。 24
- 3、殊不樂觀。 2
- 4、目前見一歩行一歩，未能看清將來。 8
- 5、要是找不到工作，亦可托家人或熟人。 0
- 6、天無絕人之路，到時自然雲開見明月。 2
- 7、來則安之，無須顧慮。 6
- 8、其他(請註明) 2

(八) 你目前所選讀科目的原則

	很重要	重要	次要	不重要
1、符合個人興趣的發展。	27	23	6	1
2、將來找出路比較容易。	15	27	9	3
3、對社會有所貢獻。	19	17	14	2

如果你個人對以上任何問題有其他意見，或者對於華埠發展、中文教育，甚至於男女關係，等等，有特別意見想提出，請簡明申述。

在第二題的「其他」欄裏，有填上：「華人在社會上的表現」及 people themselves。在第四題的「其他」欄裏，有填上「真理戰勝邪理」，在第七題的「其他」欄裏，有填上「甚樂觀」及 rely on God。

在最後的意見欄裏有七位填上，他們的意見分別為：

- 1、唐人街太雜，太多賭館及舞廳。
- 2、文化革命，從傳統 in-going 的牢籠中走出，變得主動、開放，重組織。爭取自己的權益。
- 3、似乎唐人街餐館太多，使人誤會中國人祇懂飲飲食食，而缺少文化或藝術性的機構或活動。

此處的中國青年男女亦表現出濃重的個人主義及功利主義，祇求享受而不能團結一致去改造華人的福利問題以及在北美洲的地位。

- 4、華埠被歪風所籠罩着。

中文教育——怎樣去提高一般小孩子對中文的興趣，仍屬最重要的問題。

- 5、在第一項問題中，有幾項是令人無以作答，如有些影片是揚威海外，但有些則不堪入目，所以很難一概而論。

- 6、我祇是一個坐井觀天的動物，與一粒微小的砂在沙漠上毫無分別。

- 7、中國人甚不團結，應加強國人間社團活動。

幾點分析：

(一) 第一個問題涉獵所謂「功夫片」。這類電影非常多，因此完全是假定對「功夫片」的籠統印象而言，亦即指大多數而言。我們向一部分人解釋，如果認為「功夫片」有良莠不齊的情形，可以在意見欄中特別提出。但許多人對於「功夫片」指那幾套，沒有清晰的概念，因此感到我們這種解釋是無須要的。

如果把1至4看作是對「功夫片」採取肯定態度的意見，把5至8看作為否定態度的意見，那末我們總結出，在61份問卷中，有5位是「完全」肯定的，有19位是「完全」否定的，而有33位是「未定的」，即是有肯定的一方面，也有否定的一方面。從以上結果來看，大多數人對「功夫片」是採取了否定的態度。尤其是認為「粗製濫造」及「渲染暴力」(即5與9)佔了絕大多數。認為「功夫片打開中國電影市場」(即4)的十四個人中有七位認為「功夫片多屬粗製濫造」(即5)。至於較為肯定的意見是所表現的「俠義精神」的內容，佔了三十人。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極多女性否定「功夫片」的娛樂成份，換言之，認為有相當娛樂性的以男性居絕大多數。

從這項調查的結果，我們看到，對「功夫片」意見的答覆相當參差不齊(對於其他幾項問題亦有同樣情況)。例如許多人一方面認為內容有渲染暴力之處(7)，然而，我們可以這樣大膽的假設，「功夫片」並不為多數人所喜愛，「功夫片」不能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或者說，祇能作為中國文化的反面，決不能作為正面的、嚴肅的一面。

(二) 從以上列出的結果，我們看出，「在北美洲比較能夠真正地反映出中國文化」的項目，依主次而排，分別是：①文物展覽，②中國菜，③針灸麻醉，④關於中國的專題演講，⑤唐人街(指外貌予人的印象)，⑥英譯的中文書籍，⑦文化節或晚會，⑧雜誌、報紙、書刊。

我們可以假定這樣說：文物展覽，中國菜，針灸麻醉三者在北美洲大致上是被認為道道地地的中國文化的表現。而功夫片跟麻雀兩項，不能「列身」在中國文化內，是受到「摒棄」的。

(下轉19頁)

「魁北克人黨」政府在四月一日公佈了它的「語文白皮書」，這白皮書是該政府預備於今年夏季推出的語文法例的先聲，在宣佈這語文政策時，魁省文化發展部長羅倫（Camille Laurin）已表示：魁省政府是不會接納聯邦政府對其將要推出的法文法例所加的任何禁制，他亦警告，其政府將不理會聯邦政府謂其語文政策不合憲法的指控，看來魁省政府是要一意孤行地推出其語文政策。

「語文白皮書」大大加強了法語在魁北克省的地位及使用範圍，但同時却違反了英國北美法令中，指明英法兩種語文在魁省皆可享有同樣地位的一條款。

魁省的新語文政策如被實施，將有以下的新猷：

●所有新移居到魁省的人士，不論他們的原籍是何國，或加國何省，皆須將他們的子女送到法語學校去攻讀，對臨時性居民則有例外處理。

●某小孩如欲進入英語學校攻讀，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他或她的父母之中，有一人是在魁省內採受過英語小學教育，或其兄弟姊妹中有人正在接受英語教育。

●在新法例未生效前，抵達魁省的新移民的子弟，仍可有選擇進入英語學校的權利。

●凡僱有五十人以上的公司，必須在一九八一年以前，訂定一政策以便將法語變為工作上使用的語言，而在一九八三年將這政策實施。當這些公司完成這任務後，當局將發給它們一張「法語化」的證書。

●上法庭的公司，必須用法語申訴。

●法庭的官方判決將要用法文印發，如要英文原文必須申請。

●魁省省議會的法例將只用法文印發，如要英文翻譯必須申請。

●專業人士如律師，工程師及醫生等，必須通過更為嚴厲的法語文運用水平，此外，所有公司的招牌，告示板及通訊亦必須用法文，有些英文地方名稱亦將被改為法文名稱。

聯邦政府及其他省政府，特別是安省政府，在該白皮書發表後，紛紛起而指責「魁北克人黨」政府企圖將魁省轉為一個「一種語文」的社會。總理杜魯多謂，這政策令若干支持魁省獨立的人士也感到震驚，他說：每個社會的力量是基於它的多元文化，但魁省的白皮書將該省變為一個「封閉」社會，除法語魁北克團體外，不讓其他團體參與魁省的發展。這顯現出「魁北克人黨」是一個極為民族自大的政治組織。另一方面，安省首長戴維斯則表示：他的政府將要研究魁省是否有權去訂定這項建議中的語文法例；他在比較安省及魁省少數居民的權益時謂：在安省，政府正日益在增加少數居民的權益，而魁省剛好相反，其白皮書正要剝奪少數居民的權益。

加國建國一百多年來，在魁省內的英語語系居民實在享有莫大的少數居民權益，這些權益是居住在英語省份內的少數法語居民所未能享有的，是種情況可以被視為是一種長久以來的「剝削及壓迫」，是法語人士極難可以忘懷的事，所以當「魁北克人黨」公報其語文白皮書後，魁省省內的法語居民馬上給予這政策踴躍的支持。

事實而言，法語白皮書所訂定的政策實不至剝奪了該省內的英語居民的所有權益，而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政策推出的時刻，因為目前加國正著意推行兩種國家語文政策，但魁省則肆意執行一種語文政策。法裔人士恐防其文化日後將會遭英裔文化所吞沒或淘汰是頗為現實的，因為在北美洲，六百五十萬法語人士是一個極少數，這是可以解釋為何魁省的法裔人士這麼急切維護其語文及文化。

魁省「語文白皮書」的擬定人羅倫是該省一知名精神病醫生及作家，他是「魁北克人黨」的中堅人物，地位只在黨魁雷域克之下，他一直以歷史觀點來處理魁省的問題。他說：魁省是於一七六〇年遭英裔人士所征服，隨後在魁省內施行的是「英裔經濟寡頭主義」，但由於魁省居民的自決情緒永不息滅，所以才有目前突起的獨立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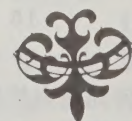
一般支持魁北克獨立自主的人士均認為這份「語文白皮書」，是自雷域克在一九六七年創立「自主協會」以來，發生於魁省內的最大事件，雷域克在七〇及七三年大選中失敗後，曾一度想退出政壇，主要是因為羅倫的勸導，他才繼續留下及苦戰。

當杜魯多未參加聯邦政治前，羅倫與他及雷域克皆是要好的朋友，這可能是由於他們皆是法裔的緣故，羅倫的著作指出：獨立將會替魁省居民帶來新的水平線，他謂：魁省居民好像是患有精神病的人，主要由於沒有認同感而使他們身懷缺陷，一旦當他們可以腳踏實地，他們便可以全力及全面發展。

羅倫承認當語文法例被執行後，該省的少數非法語居民將會失去了一些「特權」，他強調這些人目前所得是「特權」而不是「權益」，而因為法裔文化的存在正受威脅，所以他們是有權作出自保行動的，他說：在魁省的英裔人士，有其本身的學校，大學醫院，社會服務，報章，電台及電視台，這較在加國其他省份的少數法裔人士不知好出多少倍。

他說自一七六〇年以來，法裔人士被逼使用別種語言工作，同時，看着所有好的工作職位皆由該省的「住客」（英裔人士）當了，而現在是改變形勢的時候，但他呼籲魁省居民繼續容忍，及戒除報復的心理。

「魁北克人黨」提出「語文白皮書」以加強法語在該省的地位及使用，同時亦帶來削減少數居民權益的影響，筆者實極難給予這行動一個公平的評價。各界僑胞身為加國少數居民的一份子，相信也可體會到少數居民受大多數居民逼壓之苦，但願法裔居民於抬頭後，不會如英裔人士一般，變成第二個「大多數」在魁省內耍弄其新得的權力，加國官方語文專員基夫·斯必沙表示：他基本上同意「語文白皮書」內百份之六十的提議，亦贊同法語成為魁省主要的使用語文，他所擔心的是英語語系居民在魁省內的權益。★



（十一）社會主義

廿九日，紐約社會主義叢報總撰述哈利遜氏來訪。余在美洲，社會黨員來謁者凡四次；一在域多利，一在紐約，一在氣連拿，一在碧架雪地。其來意皆甚殷殷，大率相勸以中國若行改革，必須從社會主義着手云云。余謝以進步有等級，不能一蹴而幾。彼等皆云均之改革也，均之與舊社會現狀戰也，均之艱難也。大改革所費之力，與小改革所費之力，相去不相上下，毋寧逕取其大者焉，所謂獅子搏兔與搏虎之喻也。余以其太不達於中國之內情，不能與之深辯，但多詢其黨中條理及現勢而已，大抵極端之社會主義，微特今日之中國不可行，即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將不可勝言。若其近來所謂國家社會主義者，其思想日趨於健全，中國可採用者甚多，且行之亦有較歐美更易者；蓋國家社會主義，以極專制之組織，行極平等之精神，於中國歷史上性質，頗有奇異之契合也。以土地盡歸於國家，其說雖萬不可行，若夫各種大事業，如鐵路礦務各種製造之類，其大部分歸於國有，若中國有人，則辦此真較易於歐美，特惜今日言之，非其時耳。社會主義為今日全世界一最大問題，吾將別著論研究之。

吾所見社會主義黨員，其熱誠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謂強聒不舍，庶乎近之矣。其於麥克士（編者按即馬克思），德國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之著書，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穌教人之崇信新舊約然；其汲汲謀所以播殖其主義，亦與彼傳教者相類。蓋社會主義者一種之迷信也，天下惟迷信力為最強，社會主義之蔓延於全世界也亦宜。

哈利遜為余言，現在全地球社會黨之投票權，合各國計之，已共有九百餘萬，而近一兩年來，其黨員以幾何級數增加，不及十年將為全地球政治界一大勢力云。此其言雖不無太過，然其盛大之情況，固在意計中也。近來國際社會黨最發達，此亦人類統一之徵兆。哈氏言日本人入黨者已有九百餘人，而中國尚無一。（以余所聞在美國有余君表進者，社會主義黨員之一人也。余君親為余言之，特未能為該黨有所盡力耳。想曾入其黨者，尚不止此數，哈氏或未確知耳）。哈氏極欲與吾黨聯絡，拓殖此主義於我國，且欲得內地或海外之華文報數家為其機關報。余以中國人現在之程度未足語於是婉謝之。期以異日而已。哈氏以其黨之主義綱領等小冊子及其叢報凡數十冊見贈，余深謝之。

是日下午往訪摩爾根，摩爾根者，世所稱托辣斯大王，又稱今生計界（編者按，即金融界）之拿破侖者也。余本無事與彼交涉，特以全美國最大魔力之人，以好奇心欲一見之耳。彼生平未嘗往訪人，惟待客之來訪，雖以大統領及國防大臣，或關於一國財政上求助於彼，亦惟就諮之，不敢望其枉駕也。又聞彼之會客，以一分鐘至五分鐘為度，雖絕大之問題，只以此最短時刻決斷之，而曾無失談，其精力真千古無兩。余於前兩

日以書道來意，求五分鐘之晤談，且約期。至於詣彼窩爾街（即今之華爾街，編者按）之事務室訪之，則應接所之客數十，以次引見，真未有過五分鐘以外者。余本無所求，且不欲耗彼貴重之時刻，故入談僅三分鐘而畢，彼贈余一言云，凡事業之求成，全在未着手開辦以前，一開辦而成敗之局已決定，不可復變矣，云云；此語殆可為彼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門，余深佩之。（下畧）

（十二）紐約的華人社區

紐約全省之華人，約二萬，其在紐約市及布碌侖（與紐約相連，今合為一自治團體）者萬五千。大率業洗衣工者最多，雜碎館次之，其餘商人，則皆恃工以為生，商店大小亦有數百家，自成一所謂唐人埠者。每來復，唐人埠街衢為塞，蓋工人休暇，皆來集也。餘日則頗冷淡，吾儕在東方諸市演說，惟來復日聽眾闐塞，餘日則至者不及半數。

雜碎館自李合肥遊美後始發生（李合肥者李鴻章是也，有人認為雜碎並非李鴻章所發明，姑此存疑，編者按）。前此西人足跡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後一到遊歷，此後來者如鯽，西人好奇家欲知中國人生活之程度，未能至亞洲，則必先到紐約唐人埠一觀焉，合肥在美思中國飲食，屬唐人埠之酒酒店進饌數次，西人問其名，華人難於具對，統名之曰雜碎。自此雜碎之名大噪，僅紐約一隅，雜碎館三、四百家，徧於全市，此外東方各埠，如費爾特費（Philadelphia）、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必珠卜（Pittsburgh）諸埠稱是。全美國華人衣食於是者凡三千餘人；每歲此業所入可數百萬，蔚為大國矣。

中國食品本美，而偶以合肥之名噪之，故舉國嗜此若狂，凡雜碎館之食單，莫不大書「李鴻章雜碎」、「李鴻章麵」、「李鴻章飯」等名，因西人崇拜英雄性及好奇心，遂產出此物。李鴻章功德之在粵民者，當惟此者最矣。然其所謂雜碎者烹飪殊劣，中國人從無就食者。

西人性質有大奇不可解者，如嗜雜碎其一端也。其尤奇者莫如嗜用華醫，華醫在美洲起家至十餘萬以上者，前後殆百數十人，現諸大市殆不有著名之華醫二三焉。余前在澳洲見有所謂安利醫生者，本不識一字，以挑菜為生，負不能自存，年三十餘，始以醫誑西人，後竟致富三百餘萬。及至美洲，其類此者數見不鮮，所用皆中國草藥，以值百數十錢之藥品，售價至一金至十金不等，而其門如市，應接不暇，咄咄怪事。

西例凡業醫者必須得政府之許可，然在美國得之並不難。各醫家皆自稱在中國某學校卒業之醫學士醫學博士等，蓋美國賄賂風盛行，有錢則萬事俱辦也，自此點觀察之，則不如日本遠甚。日本唐人埠之醫生，無一能得免許狀者。

紐約者，全世界第一大市場，商業家最可用武之地也。中國至微至賤之貨物如爆竹、如葵扇、如草席，每歲銷數皆各值美金數百萬，大者無論矣，然大率由美國人手經辦，中國人自辦者寥寥。統計紐約全市，其與西人貿易之商店，僅兩家而已。中國人對外競爭之無力，即此可見，謂中國人富於商務之天才者亦誣甚矣。

紐約及東部一帶之華人，有眷屬者頗稀，不如西部之多，蓋道遠往來難之所致歟。以此之故，華童在學校者亦甚少，約計不盈百人。

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大學中之第一流也。吾中國學生一人，曰嚴君錦銘，北洋大學堂官費所派遣者，學政治法律，明年可以卒業。

（待續）

就以我們居住的加拿大為例，最近的十年出現了許多呼籲國民覺醒、爭取「真正獨立」的書籍和文章。一本叫「加拿大最後的機會」①的書，劈頭就引一九六八年加拿大年報，指出了如下的事實：

「在1963年，加拿大的製造業，54%均為外國人所擁有，60%為外國人直接控制。在石油和天然氣方面，外國資本佔了64%，外國控制資本佔73%。……在採礦冶礦業，外國資本佔62%，外國控制資本佔59%。」②

一九七二年，「加拿大獨立運動委員會（Committee for an Independent Canada）出版了一本書，題名「獨立：加拿大面臨的挑戰」，搜集了不同背景的加籍人士對這問題的意見③。他們異口同聲提出一個問題：在外國資本不斷湧入加拿大之下，國民經濟的主權逐漸流入外國人的手裏，加拿大政治上的獨立性，還可以保持多久呢？

這些加拿大人的顧慮並非無因的。首先，這世界並不是我們渴望的公平的世界。這世界的社會制度是維護既得利益者的。貧窮的人和他們的眷屬在目前的制度下不可能跟別人有同等發展身心的機會；貧窮的國家和它們的國民也不可能跟別國有同等的發展經濟的機會。我們有理由相信，過去百多年來國際間資金流動的作用，主要是增加或維護貧富國家之間的鴻溝，和糟蹋地球上寶貴的資源。結果是危害世界和平。

國際機構安排的資本流通這裏不討論了。這些資本與私人資本相比，畢竟是少數。至於私人資本，因為投資的目的不外是利潤，加上國際間的貧富懸殊，結果只會動用更多的資源去生產更多高利潤的商品——那些收入較高人士所能夠購買的奢侈品和半奢侈品。

所謂「奢侈品」或「半奢侈品」當然只是相對而言。對吃不飽、穿不暖的人來說，收音機、電視機都是奢侈品。我們身居北美洲，化十多元錢就可以買一架電子計算機。這些中小學生也買得來的東西，對我們來說，稱不上是奢侈品。可是，當我們想到，此等貨物的大量生產，實際上意味着別人更需要的物品的減產的時候，我們人手一架或數架的計算機，就是奢侈品。這些奢侈品可能耗用了第三世界國家本可用來做增加衛生設備和改良農業技術的材料。那麼，為什麼第三世界國家要出賣這些原料給外國？這有幾個可能性。一是此等原料的開發權給外國公司掌握了；一是此等原料的轉售外國可以給出產商帶來更大的利潤；一是基於外匯的需要。外國資金和技術的優勝造成外資控制資源開發的因素；外國較強的購買力做成原料外銷的因素；本地中上階層對舶來品的消費增加了外匯的需要，做成貧下階層所需品更形缺乏的因素。

此外，短視的求取利潤，糟蹋了珍貴的資源。這可以從若干曾盛產魚類水域的失收見得。在「你不搶、別人奪」的心理下，資源的開採和使用變得十分短視。難道這也是「為子女后代造福」？

目前，跨國公司是國際資金的主要來源。我們只須問它們出產些什麼貨品，動用那裏和什麼的資源，供應那些市場，獲得多少利潤，和這些利潤進了誰的口袋，就可以粗畧地知道這些國際資金的長遠影響。國際間資金的流通，助長了國際財團的成長，影響國際間的政治。據估計，跨國公司在1968年的產量達\$300,000,000,000，比全世界非共產國家的貿易額還要大。有人預料，1987年跨國公司控制下的產量將達全世界非共產國家生產額的三分之一。又由於跨國公司多是美國資本的，美

國控制的生產額在1980年可能升至所有非共產國家的64%，在1990年可能升至80%④。很明顯，其他國家對這些趨勢一定不會感到滿意。自衛和爭霸的心理的同時越高漲，戰爭的危險就越大。

外國資本對輸入國的影響

除了國際間的影響之外，外國資本對輸入國還可能產生下列后果，輸入國是不可不知的。

- 一、增加國民對外國依賴的心理。外國資本的技術輸入，減輕了本國在這方面發展的壓力。因此，在輸入技術的同時，應加強鼓勵本地技術的發展以作抵消。
- 二、增強本國對外國在物質上的附庸關係。除了心理上的依賴性增加之外，外國技術和資本的輸入，客觀上使本國的技術發展更難（雙方衷誠的技術合作除外），原因是外國技術水平高，資本也雄厚，而土技術和土資本的發展却要從無發展到有。在尖銳的競爭之下，這發展是很難維持下去的。此外，外國的技術不一定適合本國的物質和社會條件。過份依賴外國的技術可能做成更大的經濟和政治上的依賴。很多外資廠商在本國設廠后，在生產過程中仍要購入大量的外國零件。這些進口品無形中增加了外匯的需要，這對發展中國家是嚴重的負擔。

多馬斯指出，依仗外國資本發展的國家中，即使經濟成長率高，却始終擺脫不了對外國的附庸關係：國民生產始終集中在礦業和農產品的加工，或進口零件的組合。前者滿足工業國家的需求，后者滿足國內小部份入息較高人士的需求。這些生產活動不可能產生足以刺激國民經濟轉化為工業國的連鎖反應，對生產技術的革新和原始資本積累毫無幫助⑤。又零件組合多以供應本地市場為主，未能增加外匯收入。

可見，如果決定接納外國人在本國投資，此等資本應與本國發展計劃相適應。不考慮長遠經濟發展需要而隨便歡迎外資流入，是非常危險的。

- 三、資金向外倒流。資金的輸入在短期內是滿足了國家發展的需要。但是長遠看來，外國人是會把利潤匯返外國的。雖然在50年代，由美國輸入加拿大的資本較匯返利潤多出了130億元，在1960至67年間，倒流回美國的利潤竟比資本輸入多出180億元。在同期內，美國對外投資合共1940億元，匯返的利潤却達3330億元。此外「外資」中，頗大的部分可能還是本國資本被外國公司用舉債或其他方式汲取來在本國投資的。1967年，美國在加拿大的分公司的擴展費用中，佔64%就是來自加拿大的⑥。

- 四、對國民的分化作用。外國的投資者，要在本國得到接受，往往會起用本地的人才，並對本地僱員提供比本地公司更好的報酬。這就產生一種分化本國國民的作用。因此，即使某外資公司的管理級人員超半數是本國國民，它也不一定首先照顧本國的整體利益。實際上，在外資機構服務的本國國民，由於分享了外資的繁榮，在決策上反映外國資本的利益是很自然的。

格蘭特在1965年解釋加拿大國民為什麼不很團結，就是這樣說的：「他們之中很多發覺，作為美國資本在加拿

大的代理人去發展美國分公司，會對自己帶來更大的收入。……資本主義到底是以尋求利潤為最重要的一種生活方式。就是這種生活方式，把本國的富人帶引到北美洲大陸化的道路⑦。」利惠得（Levitt）進一步解釋魁北克省的獨立運動說：「那些把魁北克省的分裂看作加拿大本身存亡的關鍵的人仕可以試問自己：當佔重要地位的英加人仕也不重視加拿大的獨立時，為什麼法加人仕還會希望留在聯邦之內？試想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難道他們真的跟着英加手拖手、雙文化雙語言地，漫步進入美帝國的軌道？難道魁省人仕的相信獨立可以帶來本身文化上生存的較大的機會，還值得大驚小怪？」⑧

五、外國價值觀念的輸入。外國資本輸入的同時，必然會反映在宣傳媒介裏。報章、雜誌、電映、廣告，不停地向本國國民灌輸外國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這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就是讓固有的思想和傳統的生活方式有機會接受外來的挑戰，從而得以充實和改善。壞處就是，一旦宣傳媒介被外國資本或跟他們相同利益關係的人把持，真正平等的思想交流是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媚外的思想和言論。這就危害了本國的文化生活的獨立性，甚至影响了本國對社會發展道路選擇的獨立性。上面引用利惠得的說話，可以作為本段的駐腳。

六、最后，外國資本的輸入增加本國官員貪污的機會，影响政府的聲譽和效率。

由此看來，限制外資輸入的目標，不外是讓本國人民有機會走自己要走的路，防止外資對他們腐蝕和分化的作用，保證國民可以在開放而平等的社會條件下，創造自己的文化生命，

促進社會的進步。這裏，我們一再見到取消財產承繼制度在國際上的重要性：取消了世襲制度，實現了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民主，實現多邊（Multilateral）的移民開放政策，就可以廢除對外資輸入的限制，讓技術和資金可以自由流通。否則，對國際資本的輸入加以若干限制是必要的。在國際間未能達到這些條件的時候，起碼我們要做到不動產的社會化：就是不動產始終屬於社會。不論外國或本國人民也不能購入它們，而要按時繳交社會所徵收的租金。所有外國資本在投入之前，應接受詳細審查，待確定了不會跟本國的長遠發展抵觸后，才獲准進口。

註釋：

- ①Eric Harris, Canada's Last Chance, Savvy Ltd., 1970
- ②下面是較新的統計數字：1970年加國製造業內，外資佔53%，外人控制資本佔61%。石油天然氣方面，外資佔61%，外人控制資本佔76%。採礦冶礦方面，外資佔59%，外人控制資本佔70%。見1974年加拿大年報。
- ③Abraham Rotstein, Independence The Canadian Challenge, Committee for an Independent Canada, 1972。
- ④見上書，頁29。
- ⑤Clive Thomas, Dependence & Transforma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P. 100—101
- ⑥Rotstein, Op. Cit., P. 30—31
- ⑦George Grant, Lament for a Nation,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65. P. 47
- ⑧Rotstein, Op. Cit., P. 167



HOWARD WATCH & JEWELLERY CO. LTD.

910 QUEEN ST. EAST TORONTO, ONT. M4M 1J5
(CORNER OF QUEEN & LOGAN) TEL: 461-1453
HOUSE OF DIAMONDS GOLD JEWELRY & FINE WATCHES



Omega Watches
Longine-Wittnauer
Bulova Seiko Orient
Cardinal Watches

本號專營
名廠手錶
各種名貴



金銀首飾
鑽石
訂婚介指
結婚介指

COMPLETE SELECTION OF DIAMOND
ENGAGEMENT RING, WEDDING RINGS
AND DINNER RINGS
10K, 14K & 18K GOLD CHAINS AND
CHARMS.

憑券可得
八折優待
20% OFF WITH THIS AD.

WE SPECIALISE IN CLOCKS WATCHES &
ALL KINDS OF JEWELLERY REPAIRS AND ENGRAVINGS
PAINLESS EAR-PIERCE BY APPOIN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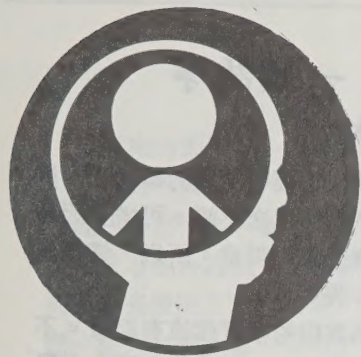
華僑旅行社

AA TRAVEL INDUSTRY

廉價機票

201 DUNDAS ST. W.

598-0423



柳亞子

我的兒童教育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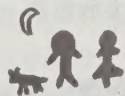
我對於兒童教育，是主張自由放任的，孟子與說得好：『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故古人易子而教之。』（手頭無書，大旨如此。）這『責善則離』四字，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不獨父子之間，就是父女之間、母子之間、母女之間，又何嘗不如此呢？

近世對於兒童教育最偉大的人物，我第一個推崇魯迅先生。不但他喊出『救救孩子』的口號，要給中華民族下一代奠定不拔的基礎；就是他對於他的愛子海嬰先生的態度，也是值得敬佩的。聽說有一次，魯迅先生在家裏請朋友吃飯，有一碗菜，海嬰先生挾了一筷，嘗嘗味道，覺得不對，就嚷道這菜壞了。但同時吃過這菜的，却並不覺得壞，大家以為是小孩子亂講吧了，不去理他。不過，魯迅認為小孩子的意見，是不應該抹煞的。他自己把海嬰先生吃剩丟下的那一些，挾起來嚐一嚐，果然味道變了。你想，除了魯迅先生，誰還能有這種尊崇兒童、愛護兒童的偉大呢？

海嬰先生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常常對人家講：『我的父親還不夠偉大，要是我做了父親，一定比他還好。』這句話，在沒有頭腦的人聽起來，總以為是海嬰先生的孩子話吧了。不過，我以為這便是海嬰先生偉大的地方。按照進化論講起來，子女的一代，無論如何，應該比父母一代高明些。亡友高天梅有詩道：『我言為子者，慎勿肖其父；我言為孫者，慎勿肖其祖。』他是提倡『不肖主義』的；但所謂『不肖主義』者，是要子女比父母更高明，更能適合時代。中國人老話說：『士習高曾之典籍、工執父祖之矩矱。』（原文已忘，大意如此。）這句話，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因為世界上事事物物，都是不進則退，決無中立的餘地。中國人喜歡崇拜祖先、追懷古昔，而不想做一個跨灶的兒孫。倘然照這種人的辦法攬下去，一定非先由人類退化為猿猴，再由猿猴退化為下等動物不止，（這才是復古呢。）那末，真是魏武帝所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陶學士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中華民族也幾乎有亡國滅種的趨勢了。所以，我覺得海嬰先生的觀點是很正確的。並且，因為海嬰先生的偉大，更顯出魯迅先生的偉大來，海嬰先生才不愧真正是魯迅先生的繼承人呢。

我自己是個典型的士大夫，但我很反對儒家的學說。在吳又陵先生隻手打孔家店的時候，我是舉起雙手來搖旗吶喊的。我以為儒家學說是代表封建時代的統治階級說話的。那中間無論如何，不免有毒素，在現時代去提倡它，當然是開倒車，更要做青年的絆腳石了。我們要做青年的墊腳石，而不要做青年的絆腳石；這好像也是魯迅先生的偉論，我是非常欽佩。何況，章太炎先生批評儒家，還說它『宗旨多是在是非之間，議論止於函胡之地』；那末，就在當時，儒家也並不能算是頂高明的學說吧。不過，它的單詞隻義，却也時有可取之處；我在上面所引孟子與的幾句話，就是一個例子。還有，他所講的『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的一段話；以及孟二先生所謂『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云云，我都很喜歡它，覺得可以拿來做我自己安身立命的座右格言呢。辛亥革命以來，讀經廢經的問題，有好幾次的循環起伏；現在，好像又在甚囂塵上吧。我倒並不主張把線裝書一起丟在毛坑裏去，覺得這議論太不合理了。並且，我以為凡是在五六十歲左右的黨國要人，他們倒是應該多讀一下中國底舊書的；不但經應該讀，而且史也應該讀。我主張應由當道採用卑禮厚幣的方法，蒲輪安車，招致海內廣聞博學之士，待以師禮，每天教授一二小時，那末，柔日讀經，剛日讀史，開班上課，恰是挺好的辦法，不比出重資叫人翻譯聖經高明到一百倍嗎？但倘然照妄人的議論，要在小學校中提倡讀經，以妨碍中華民族下一代國民的理想，那我又要效法魯迅先生，大喊『救救孩子』了。★

一九四三、四、四（兒童節）



（上續 13 頁）

文化活動方面，「關於中國的專題演講」比較上佔優勢，而搞「文化節或晚會」則較薄弱。

（三）由上列的結果看出，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努力工作或學習」重要或很重要，祇有三個人認為是次要的。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關懷華人社會」比「投入北美洲社會」的份量較大。

（由於有幾個人對這問題未有答覆，因此上列結果中每一行數字加起來並不等於61，以下有同樣情形出現。）

（四）大多數人對「四人幫」事件的態度是比較保留的，表示要認識清楚才能發表意見，而有表示意見的亦以為這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居多。有相當多人表示沒有興趣，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四人幫」是指什麼。從答覆這問題的結果，可以清晰地分出幾種類型的人：①以1與3，或者1與2作答，②以3與4作答的，③以7與8作答的，④以8與9作答的，或以4與9作答的。

第①類估稱之為「左」，佔8人。

第②類估稱之為「中」，佔14人。

第③類估稱之為「右」，以4與6作答的祇有1人。

第④類估稱之為「保留」的有23人。

第⑤類估稱之為「沒興趣」的有10人。

（八）選讀科目的原則，認為1比2（1是個人興趣，2是將來出路）較重要的有25人，認為2比1較重要的有12人，認為同等重要的有18人。

死 亡

。金帛。

一個年輕人，用一條繩子，結束了他的生命。他，二十三歲。

二十三歲，該是一個多麼美好的時光，青春、理想、愛情、都在期待着一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

他從工作的地方，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回家，你可以想像一個非移民的東印度人，可以找到的職業，他在一間餐館裏工作，就在他回家的途中，在一個地下鐵路的月台上，遭兩個種族主義者的毆打，把他打至重傷，兩腿永久殘廢，這兩個行兇者的理由是：他們是白人，而他是非白人。

兩行兇者被逮捕了，「公正」的法律把其中一個裁決了，而這社會的「良心」也給了受害者萬五元的金錢。於是，一切的醜惡、犯罪、傷害彷彿都在這些金錢的補償中洗刷了。「我們給了他錢」，於是這個社會又理直氣壯、自由、民主了，又可以向那些「野蠻」人炫耀他們的「文明」了。

你可以計算一下，一個只靠出賣氣力的人，在失去了兩條腿之後，用一萬五千元可以生存的時間，而「公正」的法律，在查出他是非移民後，立刻要他每星期到移民局報到，目的是嚴防他工作，據說是為了防止這自由、民主社會法律的不受破壞。

在遠方的故鄉，每一個月等待着從微薄的收入中贍下來的錢來養活的父母、弟妹；還有他的路費，是經過多少個窮親戚、窮朋友的手中借來的，他們，也在等待着他吧？

這許多的重担，他解決不了，只好用一條繩，來解決他的生命。

負責保護社會人士安全自由的警務處呼籲：以後任何的種族毆打事件，請勿干預，以免擴大事件。

種族主義者有權毆打無辜的人，而被打者却要「避免擴大事件」。這就是社會的自由、民主。

世界上本來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只有一個干澀的人間，而人却把這人間變成比意念中的地獄更像地獄。

時光的流駛，在滌蕩着這血跡。

然後一切都是相同的，一切還會繼續重覆下去。

只有外面樹上的幾條老枝，伸進風裏，不甘心地擾動這個冷漠的世界。

×

×

×

這些人物只是一些卑微的小角色，他們既沒有豐功偉績，也很少雄心壯志，他們只是死皮賴臉地在掙扎中過活，像小丑一樣忍受嘲笑和屈辱，朝不保夕地生活在文明的邊緣，他們服從於自己殘酷的命運，對世界沒有半點奢望。

但是，連這樣一點起碼的生活權利都被剝奪。

×

×

×

死亡只有兩種，一種是屈服，在平庸和屈辱中死亡，另一是在鬥爭中的死亡。

當現實的殘酷的鞭子抽打在我們的身上的時候，我們只有奪過鞭子，回敬他們。★



真理的寶藏：一個故事

一學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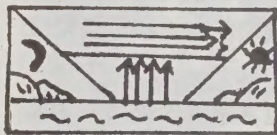
真理的寶藏埋在八達國的地裏，已經數不盡的年代了。真理是宇宙間最豐富的珍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惜，因為八達國的人多是愚昧之輩，而且貪念私心很重，所以，懂得辨別和善於利用這礦物的人，實在少得可憐。

在八達國的歷史上，成功尋到真理的事實還沒有記載。不過，不少自認找到真理的人自立門戶，多以真理的創見人居。他們不知道，真理不屬於任何人，或任何宗派。當他們互相攻訐，自以為是的時候，真理的寶藏仍靜悄悄地，埋在地下；即使他們採得的真理礦石，也因為未經提煉，徒增煩惱而已。

真理是世間最豐富的礦藏，但它需要嚴格的認識過程來提煉。別人的幫助不能代替個人的努力。真理是不可以壟斷的。它既不是基督教的私產，也不是佛教、回教、或印度教所能獨佔的。它不是馬克斯創立的，也跟亞當·史密斯毫無關係。它用不着戴上什麼名字。任何名字也不可能改變它那堅純的特性。

已認識真理的戰士勝利了。愚昧的人却不懂得他們確是勝利了。他們捧着真理的礦石而不去提煉，却咒罵別人找不到真理。由於真理的提煉需要個人的苦功，看到了真理的戰士對愚昧而自以為是的人也毫無辦法。他們當然不會高聲告訴別人他們的發現。因為：難得的不是真理礦石，而是處理這些礦石的正確態度。★

四度時空：四個年青人
在四個空間裡
的
不同
思想和感受



吳 姆

志華

一陣刺耳的門鐘。

該是什麼時候了，心裏盤算着，中午了吧。喫了昨天晚上剩下來的飯餸也該有三四點鐘了。也弄不清楚是什麼時刻，清早吧？管它咧，早是吃，晚也是吃，沒多大的分別，還不是黑漆漆一片，總之是餓起來和了滾水吃便了。那麼大的一把年紀，又是孤零零的一個人，沒誰管得來着。那麼一想，眼眶就注滿了淚水。

李婆，送飯來的嗎？

那來的那麼早，還不到十二點咧！

遠親不如近鄰，真哪！要不是幾個同樓住的閒來幫幫點點，說什麼也沒法子照顧自己。那裏的去摸呢？碰碰撞撞的，額撞在床沿枱角的地方還火辣辣的。話得說回來，枱若放遠了，到那裏去摸呢？要茶沒茶，要水沒水，萬一頭暈起來，白花油捫一整天也捫不着，昏死了沒人知道就壞事了。

也真連累了梁姆、李婆她們，算年歲吧，沒誰比自己少，人家誰不是的的扎扎，要到那串便到那串。自己呢，却祇有乾坐在床沿，獨個兒發呆的份兒，聽聽房外的雜響人聲，餓了便喫幾口飯，完了又佛一般的悶坐。就連吃飯吧，若不是李婆跟着眼，拌和飯餸，總是飯還飯的喫，餸還餸的剩在飯盒一邊。廚房近就在隣壁，隔祇隔了一條防火後梯的那麼多的位置，摸不來就摸不來。人家好心，綁了條繩子，也好有個憑藉，沿着繩子端找去。

想着想着，淚水便如河水泛濫般，擋也擋不回去，癢癢的爬滿了面。摸了藏在枕頭下的毛巾，揩去淚水，抹了一把鼻涕。打門了，該是送餐來的吧！

李婆，李婆，來了嗎？

還沒有呢！該快來的了，外面下着大雪咧！

下雪啦，又下雪啦。呢呢喃喃着。真有點寒寒的感覺，拉拉披在身上全沒了鈕的絨線外套。眼瞧也瞧不見了，該怎麼把鈕縫回去呢！唉！怪都怪自己，人家好意介紹個眼科專家，說是台灣來的，可是醫所遠遠的，又不出診，叫我怎好辦。行怎行得來，私家車又顛顛摔摔的，行不了一條街位便吐了整膠袋，受不了，怎受得了，再說，就近的醫院便割了兩次，不是現時瞎了眼睛亂說話，好沒好了，壞倒壞多了。先前嘛，模模糊糊的總還覺着幾個閃動的影子、火光，也不知道是這裏的醫生不行，還是自己的命不好，那麼一割再割的，連那僅有的光影都割掉了。其實香港那時，什麼的法門兒沒試過呢，打針吃藥的西醫、中醫草藥、求神拜佛祈願、針灸艾灸，就叫生不了靈，祇有壞的份兒，認命啊！

香港，都是香港好，沒這兒那麼悶法兒，總好聽聽電台廣播劇或什麼的，粵曲也好。那時總還像個家，兒子媳婦及孫兒，幾個人熱熱鬧鬧的。如今他倆口子及孫兒住東區，留下自己在幢唐人街內的舊樓，孤獨獨的一個人，要多悶有多悶。說什麼往外國看看世界吧，是什麼標緻的西洋景，怎樣又圓又大的月亮，瞧也沒瞧着便成了盲婆，不管白天黑夜，總是黑昏昏的，怎好過日子。死了吧！死了落得個安樂簡單，總比乾坐受悶好，倒是惡命死不去難抵。

確然是沒有真正想死的念頭，總惦記着那幾張熟落的面，光影割斷後僅有的記憶，祇是煩悶時的厭氣話。洗把面吧，送餐的快來了，喫了也好洗洗衣服。

正沿着繩子往廚房，門鐘又響起來。沒等她開口問是誰，李婆早在樓下大聲的嚷叫着：

來了，來了，送餐的啊！★

決不糊塗地過此一生

二了

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新事十論」底序言上說：「決不糊塗地過此一生」，梁啟超的「志未酬」唱出了「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最近與你的兩次談話，其意在此。

我們底思考還沒有達到成熟的時期，容許我坦蕩的表白，我們還是在摸索中。人生、革命、真理、信仰、理想、愛情、前進、落伍、思維、宇宙觀、辯證法、形式邏輯、與及其它一大串的問題，我還沒有弄清，也慶幸未能弄清。

社會主義的體系不是看過三兩本冊子便可以了解的一門學問。過去的幾年間，自己一直嚐試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日常生活的現象，亦套用唯物史觀來演繹社會的時代背景。柯爾曾經說過：「我之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在從他的理論中，找到了他所以分析社會的正確的方法，拿來分析今日政治的和經濟的根本問題時，較之其它方法所得的結果，要明白些」。

你企圖把馬克思主義和基督精神連結在一起，是否根據於二者均朝着解放人類這一信念來看問題，我不大清楚。即若如此，亦非一定是虛幻的構想。羅素認為哲學不僅為解釋世界的方法，而「真正的任務，却應該是改造世界」；因此，羅素說馬克思和杜威「在物質的形而上學的形態方面的意見，實際上却是一致的」。馬克思底資本論是在倫敦博物院裏寫成，耶穌則在街頭上實踐他的理論；前者可說是從象牙塔裏建立自己的理論基礎，後者則以行動證諸一切，然二者的精神皆為淑世。

你能夠拋掉包袱，到工人中去，比起那些空喊口號而死抱包袱不放的人，相距又何止千里？我希望看到的，亦正如此。

前進吧！你是會踏出一條道路來的。

×

×

×

遺忘是人類的屬性，倒是人家的過錯才不輕易掛漏。歷史規律非必然成直線，是人類經驗倚着逢二進一的形式積累，走了上去，又倒退下來的結果。人們稱這為歷史底進步。

別相信人性不變論。新的註釋、歪的演繹，被看為是這個時代的創新。讓機器來統治一切吧！你會滿足於主人翁的稱謂！

有誰甘願付出生命和安逸去改善世界？有人說：就讓他媽的那些肚滿腸肥的人剝個痛快，到頭來他們不也還不是同樣地吸吮第三世界人民的血和汗？丫嚟！人命如草芥，你可以安心去睡？不！

在象牙塔內高唱工人萬歲，大魚大肉後為窮人而痛心。去你的！收起你底歌喉和憐恤！生活是現實的，肚皮更知榮辱！用行動訴諸你底心智吧，被踐踏的人將爭取自己的幸福！★



編輯先生：

讀畢貴刊第三期，得到一點點關於華工在北美洲的情況，但都是一些過時了的歷史，目前工運在加拿大的進展情形怎樣，工會在工運上扮演一些怎樣的角色，相信很多工人如我輩是很想知道。我手上有些關於目前國內的工人福利的資料，海外的同胞對工人當家的祖國的工人生活情況，除了透過一些宣傳性的刊物，看到的祇是工人生活的某一方面，關於工人福利的保障所知便少了。隨信附同的資料，敬希貴刊能予以轉載，俾其它讀者可以作資料用。 祝

祺安

華人一工友上

中國工人 福利簡介

— 集思 —

我們也許會感到奇怪，中國的國務院沒有「福利部」，究竟福利事業怎樣在全國實施？其實，中國的福利事業通常和國家的經濟單位分不開。公社和工廠分別負起照顧社員和工人福利的責任。在公社或工廠每年都有定額的經費用於建設福利事業，以廣州重型機械廠為例，每年的福利金佔全廠工資總值的百分之十一。本文將介紹中國一般產業工人的福利情況，資料來源是筆者參觀見聞及參攷有關報導整理而成，特別是數據資料或許有出入，只希望對讀者有參攷作用。

工作時間：

分三班制。日班八小時，夜間第一班為七小時半，夜間第二班為六小時半。從事夜班勞動者，有額外的津貼。

工資制度：

根據工種、工齡而不同。一般是八級工資制，由三十元至一百二十元。薪級按工人的勞動態度、技術水平及工齡長短而評定。一般平均工資是六十五元，每日三餐在食堂的膳費約十二元。

退休制度：

在國營機構之退休年齡是：男性六十歲，女性則為五十歲。退休後可按月領取退休金，數目按工齡計算。五至十年者可支取退休前工資的50%，十至十五年者可支60%，十五年以上者則可支70%，如有特殊貢獻者則可獲更高比率之退休金。

有薪假期：

- 年假：一年七天。如家庭不在城內，則有探親假期十二天。（不包括交通時間，另有路費津貼）。
- 病假：一般為有薪。如工人因病長期不能工作時，則可支取病假工資（數目按工齡及病假長短發給），並可保留職位。

- 產假：婦女一般享有五十六天產假，孖生或難產者可獲七十天假期。又嬰兒未滿一週歲時，母親每天有兩次附加的餵奶時間，每次三十分鐘，在過後的六個月則減至每天一次十分鐘。

特別津貼：

- 非因工死亡：喪殮費為兩個月全廠平均工資。另一次過之撫恤費。（一名家屬者為該工人六個月之薪金，兩名家屬者為九個月，三名者為一年）。
- 家屬死亡：喪殮費為半個月全廠平均工資。

醫療照顧：

一般國營工廠都設有衛生院，而屬街道組織的工廠則設衛生站。工人可享有各種的服務：

- 治療：一般普通疾病，小手術、牙科及住院服務。如屬嚴重病症則送往省立、市立醫院。目前紫外光及針灸治療都甚為普遍。
- 預防：灌輸對職業病的知識及預防措施，並替工人進行定期體格檢查。一般衛生院都設計劃生育室，指導有關生育知識。另廣泛推行每天休息時進行廣播體操，保障工人健康。
- 費用：掛號費通常是一角，藥費另計，一般約幾角。工人看病或住院完全免費，家屬則是半費。

文娛生活：

一般工廠都有各種文娛活動。廣州重型機器廠設有球場、圖書館、電影院等設備。工人亦組織各類文藝及體育活動。此外，廠外之工人文化宮，亦專為工人提供各類工餘的康樂活動。

工人宿舍：

甚為普遍。供未婚者居住的較多。工人宿舍一般都比較簡單，在西安的一工廠，三個人居住的房間，房租只是每月六角錢。

除工人宿舍外，工人新村亦是很普遍，工人新村設備齊全，房租以面積計算，在上海，一個供六口居住的兩個房間及兩家合用之廚廁，房租是六元半。平均租率是每平方碼0.2元。

- 婚假：三天。
- 家屬喪事假期二、三天。

勞動保險：

國營企業設有安全技術科，負責教育工人生產安全知識，檢查安全設備。另設勞保基金，照顧工傷或因工死亡等事的。

- 工傷：獲全薪假期直至痊癒，另由廠方支付醫療、住院及伙食費之百分之八十。殘廢者則終生支薪。
- 因工死亡：喪殮費為三個月全廠平均工資。另家屬每月獲撫恤費（一名家屬者獲該工人薪金之百分之廿五，兩名家屬者為百分之四十，三名家屬者為百分之五十），另負責養育子女至十九歲之全部費用。

其他：

除上述各種照顧外，還有工人膳堂及托兒園。工人大學，業餘學校等進修機會。

原文出自香港出版的「社會服務通訊」1977年4月號 ★

獻給為人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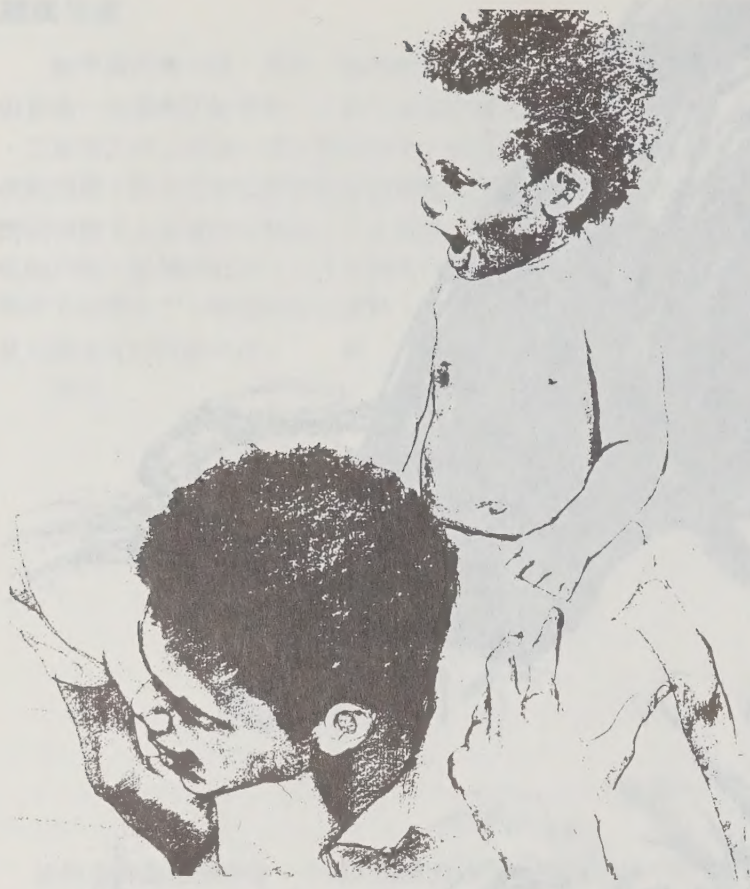
李落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親面前，仰着臉問：「媽媽，你到底爲什麼愛我？」母親放下針線，用她的面頰，抵住我的前額，溫柔的，不遲疑的說：「不爲什麼——只因爲你是我的女兒！」

寄小讀者·冰心

「一個嬰孩，一個新生」(A New Baby, A New Life!) 是愛瑪·賓納(Erma Brenner)於一九七三年寫就的一部幼兒畫集，由薛斯民(Symeon Shimin)插圖。這部畫冊描述了嬰兒長成的過程，並且提出了嬰兒是否祇是一對共棲男女底結晶而已，他在人類歷史上扮演怎麼樣的角色，父母應該怎樣對待幼小的身體和心靈等問題。以上各插圖均源自該書。薛斯民的炭筆描繪技巧頗高，是值得欣賞的一本小冊子。



●倘以爲與其所得的不是出類拔萃的嬰兒，不如斷種，那就無話可說。但如果我們永遠要聽見人類的足音，則我以爲流產究竟比不生產還有望，因爲這已明明白白地證明着能夠生產的了。

華蓋集·魯迅



●由於熱愛和親近，我深深地體會了孩子們的心理，發現了一個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兒童世界。兒童富有感情，却缺乏理智；兒童富有慾望，而不能抑制。因此兒童世界非常廣大自由，在這裏可以隨心所欲的提出一切願望和要求。

子愷漫畫選自序·豐子愷



●對於兒女也有我的希望，一語而已，希望他們勝似我。
做了父親·葉紹鈞



●她睜開眼，孩子對她露齒笑，眼睛笑嘻嘻的眯起來，唇皮薄薄的，展成弧形，帶着一份逗弄的、惹人憐愛的神情。
最後的夜戲·陳若曦

陶朱公

(續上期)

李 萬

(電視劇本)



六

陶邸的大廳，陶嬌已改男裝，改稱商公子，陶能也裝束停當，是條粗壯忠厚三十來歲的漢子。行李等堆在地上，奴婢們一件件的往外搬運。朱公在踱步，陶夫人督導着搬行李，陶器則興高采烈的東竄西跳。

朱公停了步：「大妞，你切記我的話，你要像我樣的完全信任莊先生，不可自作聰明！」

陶商：知道啦，我會照您吩咐的辦！」

朱公：「陶能，你也聽見我的話啦，到時候別一味的順着她！」

陶能：「是的，您吶！我會向商公子提着點的！」

朱公繃了繃眉，說：「車馬都備好了？」

「都好了！」奴婢們答。

「那麼，你們就啓程吧！」說完，朱公朝院裏去了。

七

陶邸門前，兩輛駟車，車後各拴一匹駿馬。

陶夫人，陶器，陶大等向陶商陶能作別。

陶夫人：「車後面跟一匹馬幹嗎？馬背上又是什麼東西？」

陶能：「那叫馬鞍，老夫人！上趟去邯鄲時商公子向胡子一齊買來的！」

陶夫人：「拉車用？」

陶能：「不是，騎馬用的——咱們人坐在馬鞍上，兩腿分開，夾着馬肚子，讓馬馱着走，這叫騎馬。是胡子興的辦法。要說，在山道上騎馬可真比坐車方便，在咱們這兒，還得說是新玩藝！」

陶商：「在平原上跑起來可真舒服！」

陶器：「我騎過啦，姐姐帶我騎的！」

陶夫人：「大姐也騎，你騎上讓我看看！」

陶商：「我騎的可比能哥漂亮多啦！他這傻大個子沒有用，您要是換了男裝也可以騎，等我回來時教您騎，就趕路了，我們要到前面空曠無人的地方才騎一陣，在這鬧市裏，準把人驚乍了！」

車開動了，陶商陶能和衆人揮手作別，陶夫人等立在台階上望着他們的車子漸漸遠去。

八

路上：

乘車，顛波；

騎馬，飄逸；

坐船，穩溜。

北方春殘，江南春尚住，乍寒乍暖，山青水綠。

打尖，宿店，陶商陶能調笑，儼然一對小夫婦。

九

郢都。

田開方的櫃房裏，田開方接待陶商陶能，田開方是個中年的矮胖子。

田開方：「商公子，能公子，你們路上辛苦啦！」

陶商：「不辛苦，第一次南來，樣事都透着新鮮！要不是二弟坐牢，來這麼一趟，還真是個樂事呢。」

田開方：「朱公的信上說，已安排了打救賈公子，要我請您的示——」

陶商：「朱公要我去拜訪莊先生，您知道莊先生嗎？」

田開方：「知道，知道，楚國那一個不知道莊先生！大王要請他爲左相，他都不肯，後來要送他半個江山也不要。送俸祿，更不要——不受無功之祿。大王只好拜他爲師。年、節、生日的有個藉口才送上點禮去。您瞧，這莊先生人多怪！」

陶能：「您見過莊先生嗎，田公？」

田開方：「沒見過，沒見過，我也只是耳聞，莊先生這號人，和咱們買賣人不投緣！」

陶商：「您知道他在哪兒住嗎？」

田開方：「這是誰都知道的，莊先生住在南門外的一座小山邊，出了城不到十里地，幾間茅草房子。」

陶商：「煩您給我們安排一下，我就去拜莊先生。」

十

訪莊先生的路上。陶商陶能和隨人。

近郊的村落，竹、樹、溪、舟。

陶商時露初到南國的驚詫。

十一

小山邊，竹林裏，莊先生的籬門外，陶商陶能敲門，應門的是弟子孟蝶，四十歲的修道士，濃眉大眼，莊稼漢的裝束。

陶能：「先生在家嗎？」

孟蝶：「你們是哪兒來的？在家不在家，我得問過才知！」

陶商：「啊！我明白，您把這封簡呈給莊先生，看過便知，我們是陶國來的！」

孟蝶：「你倒滿聰明，人也漂亮，也怪會說話！先生就是喜歡這樣的人，你等着，我去回回看！」

穿過菜園，是莊先生的草堂，屋內陳設簡陋，桌椅之外，一琴一劍，簡冊散漫。莊先生年過六十，烏鬚黑髮，精神內斂。

孟蝶：「先生，陶國來了一對年青人，帶給您一封簡，您看！」

莊先生：「阿！」展簡急讀，才數句：「呵，是他，是他的兒子！」停閱，對孟蝶：「叫他們進來！」

孟蝶出：莊先生繼看簡，口裏伊唔着，看完。

孟蝶帶陶商進，陶能携一罐進。

孟蝶：「這是先生！」

商：「先生，家父叫我給您請安！」說着磕下頭去。

莊先生：「免，免了，請坐，你爸爸還好嗎？我們是老朋友，乃十多年的老朋友，你媽呢？」

陶商：「不在多年了，我八歲上就去世了！」

莊先生：「好，好，美人良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去得好，去得好！哈哈！你爸爸和她都寫了一頁歷史，鮮紅的用別人的白骨蘸着血寫成！瞧，你爸爸弄個名字多怪！其初是貝壳兒，後來是夜貓皮，現在叫起沙壺頭兒啦，這沙壺頭又名滿天下啦，有意思，有意思！還有你這麼個漂亮的哥兒！你那弟弟和你是雙生的，唔，唔？那麼是一對璧人，嗯！人家要殺你的弟弟！范蠡和西施的兒子要在楚國處決啦，才找我來啦！算他會算計，算他會算計，哈哈！」莊先生突然閉了口。

陶商幾次要說話都插不進口：「莊先生，您既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二弟的性命可交給您了！」

莊先生一聲不响，他嚴肅得像尊神，他原是一灣止水，剛才為飛來的石子攪動得起了一陣波瀾，現在復歸靜止了。

「爸爸給您帶來的一點北方土產，希望您收下。」陶商又說。

莊先生：「孟蝶可以帶他們走了！」

孟蝶：「這罈子呢？」

莊先生：「留着。」

陶商：「莊先生，我二弟——」

莊先生：「他自會回家，你不可再來！」

陶商陶能無可奈何的走了。

十二

田開方的後院有三間上房是留客用的，陶賈陶大爺住過，現在給陶商陶能住。

田開方在這上房裏聽罷陶商陶能訪莊先生的詳情之後說：「既是朱公和莊先生這麼交好，又這麼相信莊先生，按理說我們就不該再想到別的門路。可是，作慣買賣，總覺得路越多越好，哪條路近，哪條路省錢省事，就走哪一條！就說送莊先生的這份禮，可真不輕哩！」

陶商：「只要能救二弟的命，再重點也無所謂。您說的路子，還有哪一些，我們不妨也進行着，我來就是為救二弟的，直等二弟的官司了了，我才肯走。」

田開方：「商公子，您明天先去看過賈公子，回頭再說吧！您已夠累的啦！官裏有位崔太監，常到咱們櫃上來，他是楚王左右的心腹人！獄官那兒，就是他給吩咐的。過兩天，他來時，我給您見一見！」

陶商：「好！能哥，我們就先去看看二弟！」

十三

獄監的門外，田開方向獄卒招呼。獄卒開了門，田開方領着陶商陶能同進，獄卒出來把他們讓到一個亭子上，寒暄，落坐。

獄官吩咐：「把賈公子請出來！」

獄卒開了號子，領來陶賈，陶賈和陶商習慣兄弟相稱，陶賈不及陶商秀麗，却顯着比陶商英俊。

陶賈：「大哥，您剛到？爸爸媽媽都好？」

陶賈：「都好，你不要惦記家裏，家裏都望着你早點回去，讓我看看！你是瘦了點！沒受着委屈吧？」

陶賈：「還好！沒吃着人的虧，就是吃了點蚊子臭蟲的虧，我這幾年在南方，才第一次嚐到真味道！」

獄官：「賈公子，您也該知足了，您可看得見別的犯人？」

田開方：「當然，都是大夫的照應！賈公子，商公子，他們全家都感激大夫！」

陶商：「耐點煩，弟弟！爸爸已經托了人，你的官司會翻案的！我在這兒的櫃上住着，等你出來，咱們一塊兒回家！」

陶賈：「我也沒有抱怨這兒苦，咱們自小苦出來的，還怕苦嗎！越苦骨頭越結實！你看，我還在練功夫！」他伸伸腿，拉個架子，對陶能：「能哥，你近來的功夫怎麼樣？」

陶能：「那要問商公子才知道！」

陶賈：「哈哈！」會心的笑了！

獄官：「不是我不留各位，實在干係太重，萬一上頭查獄的闖進來，大家都不好，各位早點請請！賈公子在這兒再委屈些時候，我不會虧待他！」

田開方：「當然，當然，您自會多照應！」說着去握獄官的手，將禮物由袖子裏遞過去。

能把衣物交給賈，商和賈作別。

十四

晚上，在章台賓館，田開方，陶商，陶能，已等候崔涓多時，大家忍着不耐煩的心情。堂倌來稟：

「田公，筵席齊了多時，就開吧？」

「等一等。」田開方說：「等崔公到了才能開！」

三人無言相對，良久，聽到車馬在門外停住聲。崔涓到，一個小丑式的人物，已半醉。

崔涓：「真對不起，讓各位久等！今晚大王知道是我的生日，給我慶壽，多賜了我幾杯……嘻嘻……」

田開方：「崔公您是貴人事忙，我們多等一會沒什麼，我先引見引見，這位是商公子，陶朱公的長子，這位是能公子，朱公的義子：沒有外人，請，咱們席上去！」

酒席上，崔涓已坐不穩：「商，商公子，您可真漂亮，咱們以後多鄰近！怎，怎麼？你們都沒有娘們陪？是，是不是因了，因了我不喜歡娘們？——噫！商公子！」

陶商強忍住塵煩：「崔公，您請酒！」

崔涓：「我，我喝！我是說，今晚我得和您同榻而眠！」

陶商知他已醉，輕蔑的：「不行，崔公，我有個怪癖，挨不得人睡！」

向陶能作個媚眼：「我這能哥行，最好南風，叫他好好的伺候！能哥，伺候崔公吧！」

崔涓：「他，他，噯，人高馬大，你，你這小白臉，也許是好看不好吃！呃！」吐，睡。

十五

兩個月過去了，已是六月中，天氣炎熱，時有雷雨，商在上房裏焦躁不安。

陶能：「我們得耐心的等，朱公本來吩咐送了信後，就時回去，回去了，我們還能着什麼急？」

陶商：「回去，那像什麼話，弟弟在監裏，我們捨了他回去，不是死活不管了！」

陶能：「也許這裏邊朱公有不言之妙計，我們猜不透！莊先生是神鬼莫測的人，朱公那麼信服他！我們還再瞎着什麼急？不乖乖的聽朱公的話！」

陶商：「可是莊先生那裏聽不到一點動靜！每次去看老二，都講不出個所以然來，你不覺得老二這兩次已經在着急？在不安！我更說不出安慰他的話來！——噯，你看崔太監有辦法嗎？他可是楚王身邊的人！」

陶能：「我看這傢伙只會吹牛，騙嘴吃！聽他說說，楚王根本就不把太監當人看，他能說上什麼話？」

陶商：「那，我還是寫信，叫爸爸另想辦法吧！」

陶能：「你忘了朱公已經兩次催我們回去啦！」

十六

一個悶熱的下午，天濃陰着，雨就要來，朱公和夫人在花園的涼亭上納涼，几上陳列着解渴的瓜果。

陶夫人：「大姐不回來，定要等老二，也不知老二的官司怎樣了，你好像沒事人一般！」

朱公：「我從來算無遺策！計劃定了，只看事後與我的預見相去幾何，中間不作無謂的估量，現在去立秋只有半個月，下月中定見分曉！」

陶夫人：「你就那麼相信莊先生的本領？」

朱公：「我知道他辦這點事，不費吹灰之力，若是他不救老二，那就是老二命該橫死，所以我不會像你似的，把老二的生死時時吊在心上！」

陶夫人：「我倒要問你，為什麼你自己不去楚國一趟，和莊先生盤桓兩個月，把賈兒領回來，多好？」

朱公微笑的說：「嘿嘿，不等我踏進楚國，楚國就會傳遍了『陶朱公搭救他的兒子來啦！』那真要使莊先生束手無策，罵我笨蛋，他會躲着不見我了！你知道：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這些年，我出過門嗎？」

一聲响雷，急風驟雨一下子來了。

十七

六月廿七日，楚王派了駟車迎接莊先生進宮去，習慣上，楚王於月盡日請莊先生入宮一趟，這次提前了兩日。

莊先生換了一套葛布衣，繫了腰帶，懸了劍。

楚王年僅三十歲，已虛弱不堪，脾氣暴躁，對莊先生却異常恭謹。莊先生西向坐，楚王坐北向。

楚王：「莊先生，您知道沒到月盡，我請您早來的意思麼？」

莊先生：「不是爲了太白入彗迴吧？」

楚王驚喜：「是呀！欽天監說這是巨變，在楚分野，應到我的頭上，您得救救我呀！」

莊先生：「這個——」沈吟，眼向左右看。

楚王驚覺，怒斥太監：「你們這幫混蛋，還不退下！」

崔涓趕着大小太監走後，自己溜到帷後去窃聽。

楚王：「莊先生救救我呀！我一夜沒睡着，想着只有求你了！」

莊先生：「只有大赦，可以抵消這個星變！」

楚王：「大赦？大赦容易，我下一道旨令就執行了，赦了就保住我的命嗎？」

莊先生：「大赦是異常的恩典，可以舒散怨抑之氣，自古聖王，逢此星變，總是要赦天下的。現在楚分野，楚國疆宇半天下，楚國稱赦，定可免去人君之災了！」

楚王：「來——」

莊先生：「且慢，赦令要壬子日，七月初一頒下，即日施行，不能早，也不能遲，否則難以消盡這股災異。大王雖脫過，宮內會受災殃。」

楚王：「是，是，我定照莊先生吩咐行事！」

十八

夜間，田開方引崔涓叩上房門。陶能披衣掌燭開門，迎二人入，陶商自東間整衣入。

田開方：「商公子，崔公給喜訊來了！賈公子遇赦，初一就要出獄。今天廿七，這月小盡，還有兩天，賈公子就可跟您還鄉了！」

陶商：「真的？多謝崔公，崔公怎得的這消息？」

崔涓：「我已和田公講過一遍了！事有湊巧，昨晚欽天監啓奏。太白入彗惑，又臨楚分野，將於大王有所不利，把個大王嚇的，罷了歌舞，撤了晚膳，一夜不得安眠。今早就愁眉苦臉的擺頭嘆氣！我見時機到了，便向大王進言道：『自古聖王，遇見這種變異，唯以大赦，消此天衍』」

——你們想，這不是一舉兩得嗎？一大赦，賈公子有了赦，大王也寬了心——我這麼一說，大王如夢初醒，很誇獎我，要我以後多多進言。隨後和我商量了大赦的日期，定於七月初一，可不能透出消息去，這是國法，赦前嚴守秘密！」

陶商：「這真多謝您，崔公，我得厚謝您的恩德！」

崔涓：「不必客氣，等賈公子出來後，我定來叨擾，請，夜深了，我得趕回宮去。」

十九

廿八日，午間，田開方，陶商，陶能，在獄中亭子上。獄官到，和三人寒暄落坐。

獄官賣弄的：「各位來的正好，有大赦的消息，賈公子有救了！」

田開方老練的搶着說，真的？那可好！您已得着赦令？幾時？」

獄官：「赦令還沒下，可就要下了。剛才一位貴人來看他的親戚，他傳的消息：他說楚王今早着人封了三錢，『封三錢府』就是大赦的準備，一定要大赦了，歷來如此，我剛送走那貴人，你們就到了！」

陶商：「呵，是真的？我弟弟就要出生啦！」

田開方：「多謝獄官大夫！朱公將來一定會重謝大夫！」

陶商：「獄官，我先見見我弟弟，這真是大喜！讓他高興一下！」

獄官：「就來了！你可不能說大赦的消息，在這獄裏不能散放這消息！」

陶商：「呵！」

陶賈到了，一見陶商，就憂戚的說：「哥哥，立秋就要到了，咱們就要永別了吧！」

陶商：「弟弟，怎麼這樣想！你就要出去了，別着急！」

陶賈：「真的？」

田開方：「真的，賈公子，你的年災月危就要出頭，再耐兩天就出去了！」

獄官：「回去吧！過兩天會有好消息的。」

陶賈由各人興奮的臉上生了信心，自己的愁雲消散，歡樂起來。

二十

由監獄回來的路上。

陶商憤憤的說：「我得去問問莊先生，爸爸那麼信服他，他給辦的什麼事？要不是崔涓，弟弟定會給殺了！今後看爸爸還那麼信他不！」

陶能：「商公子，不可造次，朱公的吩咐我們不能不遵守。」

陶商：「不行！」

陶能：「就是去，也等賈公子出來一同走，我們向他辭行，看他怎麼說！」

陶商：「我等不得！」

田開方：「那份禮可真不輕！」

陶商：「我討得回來，我要把一半送崔涓！」

陶能：「不可任性，忘了朱公囑咐我們的話！」

陶商：「弟弟的命有了，我又帶回一半禮金去，雖說是掏虧本的買賣，『少虧為多！』爸爸還會說什麼？我們的財帛掙來的可不容易，你和我都不曾苦過來？不能隨便送人！」

田開方：「崔涓那裏拿二成給他，他就笑狂了，何須一半！」

二十一

晚上，莊先生在草堂裏給陶朱公修書，口中唸道：

「所囑事，幸不辱命，少公於七月朔出獄，月中當可承歡膝下。我不以赤貧傲公，公何以豪富驕我？珍物一無所需，敬着少公原封帶回。楚人沐猴耳，若餌之以甘果，將難填其慾壑；不若威之以天變，乃戰惶從命不違！」

孟蝶入：「先生，陶商和陶能要見先生。」

莊先生：「他倆在這時候來？怪哉！」

孟蝶：「陶商的口氣很不對，還非見不可！」

莊先生：「呵！那就讓他進來吧！」

陶商入：「莊先生，楚國後天行大赦，我弟弟得救了！」

莊先生：「呵！」莊嚴得像尊神。

陶商：「我來向您辭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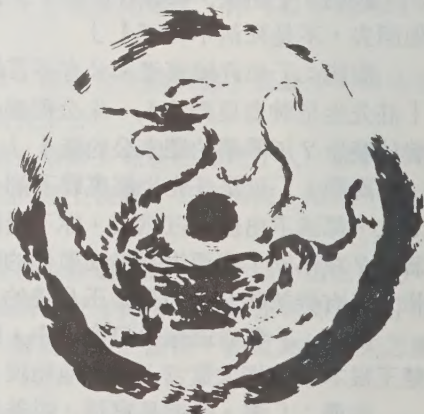
莊先生：「呵！」

陶商爲莊先生的威嚴所懾，不敢正視，倒退着走，將到門口。

莊先生：「孟蝶，把他們送來的那蠟子還給他，他是來討賬的！」

孟蝶：「是！」向門外對陶能招手，「你來自個搬，別污了我的手！」

陶商陶能携着蠟子默默的走了，陶商失掉了得寶的快樂。



二十二

莊先生兀坐着像一段木頭，低聲自語：「豎子竟敢辱我，——非我殺之，我不之救耳！——乃兄殺弟也！——天道好還，天意！天意！此豈天意歟？」

莊先生忽的站起來把寫就的簡毀掉，然後在屋裏來回踱着，一面對孟蝶談着，他又被激盪得起了波瀾！

「孟蝶！咱們在這兒呆了十年，實在太久了！我早就厭煩了這地方，想同你去找庚桑楚老師。他是楚人，竟一去流砂三十年，可見那兒是論道修行的善地。沒有這麼多的生生息息，亂人心意。只是機緣未熟，不曾去得。現在是時機了！你今夜把米都炒了，做路上的乾糧，老牛喂飽

牠，破車修好牠！我磨好長劍，整好簡冊，明天一早，駕了牛車，辭過楚王，就直奔流砂去！」

二十三

深夜，陶器的寢室，陶器睡在床上，陶夫人爲他加蓋單被，陶器却醒來了！

陶器：「媽媽，是你？你幹嗎？」

陶夫人：「就要立秋了，這下半夜已有了寒意，我怕你凍着，給你加條單被，不想驚醒了你！」

陶器：「我正夢着二哥傳授我武藝，我要他教我那手絕戶劍，他不肯，他却一劍把一棵小楊樹砍斷了，我躲不迭，整個樹頭壓上我的身來，嚇了我一跳！原來是這條單被作怪！」

陶夫人：「他沒說幾時回來？」

陶器：「誰？」

陶夫人：「你二哥！」

陶器：「沒說！」

陶夫人：「在哪兒傳你武藝？」

陶器：「好像是一片荒野！」

陶夫人：「再睡吧！天亮還有一會兒！」

二十四

清早（二十九日，月盡日），孟蝶趕着牛車，莊先生背着劍，在後跟着，往城去，望見了城門。孟蝶停了車，說：「先生，您上車吧！就要進城了！」

莊先生：「好，不能不去挨九下磕碰。違性奪情，乃自戕耳！」

二十五

宮門口，莊先生下了牛車，衛士們一見是他，都有點驚詫，宮門大夫趕來迎接。

莊先生：「請起，煩即稟大王，莊某求見！」

宮門大夫應了一聲，起來說：「請莊先生進朝房稍待，下官即刻傳稟。」

莊先生進了宮門，孟蝶拴了牛，坐進車去。



二十六

楚王在偏殿裏接着莊先生，驚惶的問：「莊先生這麼早來，有要事嗎？」

莊先生：「還是星變的事——」又停住，目視左右。

楚王又怒斥：「快滾，這幫渾蛋，我又忘了他們！」

崔涓又趕緊邀着小太監們走，自己躲起來竊聽。

莊先生：「大王的赦令未下，却已滿城盡知！」

楚王：「有這等事？定是崔涓這幫渾蛋偷聽後傳出去的，我把他們統統腰斬！」

莊先生：「不可，星變要緊！」

楚王：「呵，呵，我的記性真壞，就不殺他們，還有別的吗？」

莊先生：「滿城傳說：七月初一的大赦，不是爲了應星變，而是爲了赦陶朱公的兒子，才舉行大赦！」

楚王：「陶朱公？這名子好熟！在哪兒——」

莊先生：「就是那個名滿天下，富可敵國的買賣人！」

楚王：「呵，呵，是啦，咱們管庫的常向他的莊口上定東西，我知道了，可從沒見過這個人，他——」

莊先生：「他的次子陶賈，於今春天，在這都下殺了人！」

楚王：「殺人要償命，是楚國的國法！」

莊先生：「說的是，眼看七月初三立秋，三天之後，就要行刑！」

楚王：「現遇大赦，那是他命不該死，是個大命，有造化的——」

莊先生：「可是，百姓們傳說啦：陶朱公送了萬鎰黃金給大王，買通了大王，才特意於七月初一下大赦令！」

楚王暴躁的：「這是什麼渾帳話，我幾見過他的金子？我的金子叫他賺去不少，是真的！」

莊先生：「也許左右私下受了他的賄！」

楚王：「不會，他們不敢！我幾時聽過太監的話？沒鷄巴的話怎麼好聽！」

莊先生：「那麼——」沉吟不語。

楚王恍然大悟的：「大赦令的主意是您給出的，怎麼找起別人來了！」

莊先生：「那麼是我受了陶朱公的萬鎰黃金？」

楚王：「不，不，你不會，我這個楚國你都不要，你會要他的金子！這是那裏來的渾帳話，這些百姓都該殺！」

莊先生：「應星變非大赦不可，大赦是要見天恩的，不該爲爛言所污。我這兒有個兩全的辦法。」

楚王：「什麼兩全之法？」

莊先生：「今天月盡斬了陶賈，明天初一大赦天下！」

楚王：「對，是辦法！」

莊先生：「爛言自息，天恩自見，而且——」

楚王緊張的：「還有什麼？」

莊先生：「而且上答星變，這次星變是要見點血光，才無後災！」

楚王：「對，就照先生所說的辦，我即刻下詔！」

莊先生：「告辭！」莊先生下殿而去。

楚王：「傳旨——」

二十七

田開方後院的上房裏，田開方牽着崔涓急奔入。

田開方：「商公子，不好了，午時三刻，賈公子就要出斬啦！您得趕快去求莊先生！」

陶商：「喲？怎麼說的！」

崔涓：「今早寅末卯初時分，莊先生來給大王說，先斬了陶賈，然後大赦！」

陶商：「啊，是真的？他為什麼要殺我弟弟，你實話實說！」

崔涓急了：「大赦的主意本來是莊先生出的，大王聽他的，哪能聽我的！我不過聽了來向您討功罷了！」

陶商：「你！」拔劍便斫崔涓，陶能抱住。

陶能：「商公子，不能殺他，殺了他於事無補，救賈公子要緊！」

崔涓抱頭逃去。

田開方：「商公子，快呀，快去求莊先生！」

陶商：「還來得及嗎？」

田開方：「來得及，現在辰初，到午時三刻還有兩個多時辰！莊先生真了不起呵！說什麼是什麼，真能支使鬼神，只要他答應了，賈公子馬上得救了！」

三人急奔出。

二十八

孟蝶趕着牛車出了郢都北門，走了一段路，停了車。

孟蝶：「先生，下來吧，已經離城很遠了。」

莊先生下了車，直直腰，吸口大氣，隨着車緩緩的走去。

二十九

牢監裏，獄官接處決陶賈的詔書。

三十

田開方，陶商，陶能三人趕往莊宅，途中看日影。

三十一

孟蝶趕着牛車，引着莊先生，走上北去的官大道。

三十二

獄官帶了劊子手，給陶賈上刑具！

陶賈：「怎麼的，獄官大夫，明天要出去了，今天還得帶上這個？」

獄官：「今天就帶你過秋官那兒去，刑具要在赦後才能開釋！」

三十三

田，商，能，奔至莊宅籬門，拍門，不應，推門，門虛掩，三人進了莊先生的草堂。

田開方：「壞了，壞了，莊先生在宮裏還沒回來啦！」

陶能：「瞧，這是寫的什麼？」（指牆上的留言）

陶商讀：「陶能陶商，妄作主張，不遵父言，持喪還鄉！——天哪！」暈厥倒地！

陶能，田開方急救陶商。

三十四

陶賈綁赴刑場。

陶賈：「怎麼，獄官，這像要斬我！」

獄官：「今天的事有點邪門，小官也不明白，明天大赦，今天却先斬你！」

陶賈：「我哥哥知道嗎？」

獄官：「我看他不曾知道，這麼急，誰會給他送信？他這時正做着明天接你還鄉的好夢哩？再說，他知道了又有什麼法子？」

陶賈：「那也好，免得他見了難過！」

三十五

莊先生的草堂

陶商醒來：「能哥，快走，我得趕到刑場，和我弟弟一塊死！」

田開方：「商公子，來不及了，天已近午時，您就忍住悲痛吧！事情已經不可挽回了！」

陶商拔劍要自刎，陶能抱住！

田開方嘆氣：「能公子，您陪着商公子慢慢的回店，我趕到法場去收屍。」

三十六

二十里鋪，一個打尖的站口，孟蝶和莊先生停了牛車，莊先生在路旁的茶桌上坐下，要了茶，孟蝶卸了牛，把牛拴到一棵樹蔭下。

孟蝶望了望日影，自言自語的：「天正午了！」

莊先生不問不聞，尊嚴得像一尊神。

三十七

陶商，陶能換了素服，扶着柩車上路。

陶商默默的啜泣。

三十八

莊先生，孟蝶的行程已近孟津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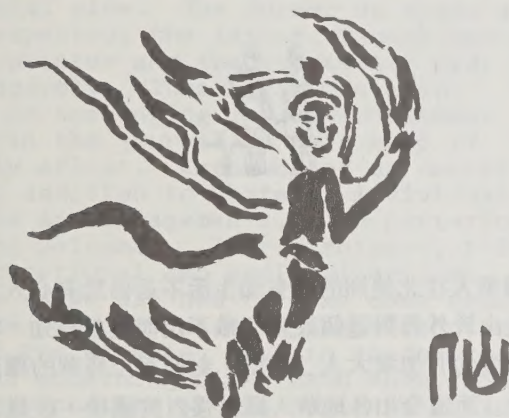
孟蝶：「先生，我們前面過河，還是往西去？」

莊先生：「西去，出函谷關！」

三十九

陶邸門前。

陶夫人扶柩車大哭，有的抹眼淚，有的解勸。衆人簇擁陶夫人進門去。



四十

陶邸的大廳。

陶商陶能無言的跪在朱公面前。

朱公微笑的：「起來，起來，事情過去了，後悔是多餘的，笨蛋才喝後悔湯！爸爸不會抱怨你的，大妞！」

朱公扶起他倆後，又習慣的踱着步，輕鬆的微笑着說：

「我知道，你一去，老二一定回不來，你不是不愛老二，可是你『忍』不住不愛財！這因爲你自幼與我一同苦大的，知道求生之難，便於財難捨。老么一生下來，便過的富有生活，出門乘車，四時行樂，他不知財是自何而來，扔掉財不會可惜！當初我所以要他去，就是以他能棄財！現在沒有什麼可悲痛的，我知道今天你會領老二的喪回來！」朱公更輕快的踱着步，廳裏一陣沉寂。（此段譯自史記）

陶大：「朱公，依您這麼說，算定的事，也只好讓他去，沒辦法擋住它？」

朱公：「對呀！『智者無能爲』，不是智者無所不能！」

四十一

沙漠的地平線上，莊先生背劍，孟蝶牽牛，緩步前進，他們已沒了破車。（完）

思雅書舍
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
二〇五號二樓C座
電話：1-416-598-0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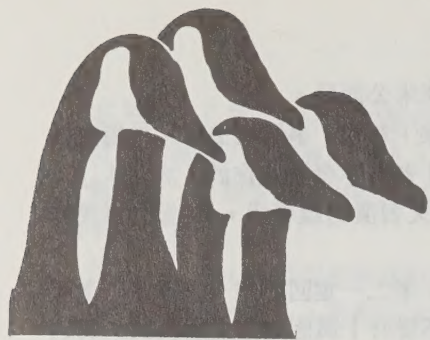


思雅書舍

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
二〇五號二樓C座
電話：1-416-598-0296



歷史 文學 政治 哲學 經濟 科技
藝術 語言 字典 字帖 音樂 樂譜
食譜 棋譜 國畫用具 兒童讀物 醫藥衛生



編者的話

人生活在特定的時空裏，個人的活動，是這期間的社會產物；那是說，不是人的心態決定人的存在，相反地，特定的社會條件決定人的心態。移民到了海外定居，生活在一個與原居地截然不同的世界，新的環境、文化、制度和社會觀念，有形無形地衝擊着移民的心態。

北美洲的華人，由於移民的先後，大概可分為新、舊兩類。新移民初抵北美洲，對當地文化的認識，遠不及在這裏出生或渡過大半生的土生和老華僑豐富；另一方面，他們多少緬懷原居地的生活形式，舊的一套人生觀和價值標準，或多或少地仍然影响着他們目前的思想。

在這個地道的文化土壤上長大底華人所受的教育和文化薰陶，又與外來的新移民有着不同的經歷。他們遇着的文化認同危機，心理上的困擾和矛盾，較諸新移民面臨的文化震慄來得更嚴重。當然不是每一位土生華人的心態都是一樣，這要看個人的家庭教育，交遊朋輩，長大的經歷而言。

海外華人，無論是新移民或是土生，個人的生活感受，處事行為儘管不同，到底還是受社會環境左右，並不單憑個人意志而能夠改變的。究竟目前北美洲華人抱着怎麼樣的心態？他們心理上最大的困擾是什麼？這正是本期探討的主要課題。



●近年來海外留學生一度扮演過先進的角色，「關心社會，放眼世界」的口號曾經响徹雲霄。踏入了七十年代下半期的海外留學生的動態則轉而要求實際、安逸，再次縮回象牙塔和名利場去。本刊在多倫多大學作的實際調查證實了這點。當然，多倫多大學就讀的華人學生是不能夠代表所有海外留學生，更

無論代表全部海外華人。誠如整理調查工作的方資求君所說「我們了解到的祇是一些局部的情况」。抱着樂觀的態度，我們自然可以用「百步之內豈無芳草」來自慰了。

●心理學家從傳統價值觀念，上一代對下一代的期望，社會環境等角度把北美洲的華人分為三類；即是傳統派，邊際人物和亞美新人。李安納君的「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北美洲的華人」便是給上述三類華人一個概括的描述。

●於梨華的小說曾經風靡一時，對於港、澳兩地的青年尤其具吸引力。於女士的小說給這些青年指示了海外留學生生活上的空虛、無根、性愛等極具聯想力的寫照。究竟於梨華的留學生小說反映了一些什麼？她十多年來的創作路線有沒有改變過？前一個問題，弼馬溫君的文章給大家提供了答案；至於後者，於女士發表中的「傳家的兒女」則是大家拭目以待的了。



●華人在北美洲的歷史和生活不是由於有心人士故意歪曲，便是由於外界對這個民族認識不足而產生無知。本年二月十二日出版的「加拿大人」雜誌，封面上用辱華的標題「猜泥慢的機會」而遭全加各地華人提出強烈抗議後，該雜誌的總編輯唐歐比道歉時便承認是無知而誤用該句子（見本刊第三期英文部份）。早年北美洲的華人組織，亦被渲染為類似黑社會的秘密團體。這些渲染不但成為白人攻訐華人的借口，更使新一代的移民誤解先人的歷史。「加拿大第一個華人會社」的文章澄清了一些歷史誤會。

●語言和文化，如唇齒相依，唇寒則齒亡，唇在則齒在。有見於此，魁北克人黨為了保存魁北克法裔加入的文化，遂於四月一日公佈了一份「語文白皮書」，製訂了該省的語文政策。本刊總第二期的專題文章「北美洲的中文教育往何處去」亦提及中文教育合法化的重要性。今期于天君的「魁北克——語文白皮書——加拿大」一文，在保存北美洲少數民族語文問題的爭論上，給大家提供了新的論據。

海外述林

The Crossroads

VOL. 1 No. 5
OCTOBER 1977

定價：加幣 75¢

第一卷第五期（總第五期）1977年10月號

編輯：海外述林編輯委員會

編輯部地址：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二〇五號二樓C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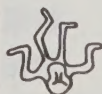
電話：1-416-598-0296

海外述林總發行處：

思雅書舍

加拿大多倫多市登打士西街
二〇五號二樓C座

電話：1-416-598-0296



EDITORIAL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the affairs of the past --- especially those which were the offsprings of soaring enthusiasm, conceived in the fortuitive meeting of kindred souls -- must come under the analytical lens of retrospection. That this was the situation in which we, at the Crossroads found ourselves for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came not as a surprise. In those heady days when the Crossroads was first launched, those of us in the editorial collective fairly expected that once started, the journal would carry itself both literally and financially. Or at least almost. We soon found out that was an extremely optimistic expectation. The intellectual support was far from overwhelming, it was much more dismal on the financial side. The former we could accept and half expected; the latter, though unacceptable, the printer and the typesetter made us face it squarely. Thus began the awful necessity of scrounging for advertisement placement in the journal to help keep it financially afloat. Each one of us unwittingly became, in addition to whatever individual obligations and engagements, also part-time advertising salesman. In retrospect, this was both an educational and sadly hilarilous experience as we all had to come down from our ivory tower so to speak, and deal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streets. But in so doing, we also learnt something first hand about those monstrous acrobatics of the business world -- its peculiar rythm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and the myriad maze of personal, busines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A world of incredible complexity in a community of a radius no more than a few square blocks.

But above all, we are face to face with the daily reality of Chinatown which was still very much stamped with the peculiarities of an immigrant society. Thus every minute concern, every expression of the daily routine are tied to that larger struggle, that desperate fight of a people for a place in this adopted country. From the rising Chinese professionals who are

inching up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ladder to the humble dishwasher in the ubiquitous Chinese restaurants struggling to keep together body and soul -- each is fighting his share of the historical ghosts. All strangers in a strange land which is not quite home. The presence of their forefathers in this country tenuous after a century of unkindly persecution. The migration of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out of Chinatown into middle class suburbia further weakens the historical roots. So Chinatown remains for the immigrants.

Within this hurly-burly, this boisterous, struggling and vital community, the Crossroads is slowly finding its place -- as every newcomer to Chinatown must sooner or later. It was overly optimistic, we now discover, to expect a journal of an intellectual flavour to be widely and popularly received in a community which is still preoccupied with very rudimentary concerns of the 'rice bowl'. We are now **content** to carry on our work with the small but substantial audience we do have: among student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ocial workers, the professionals, and those who are socially concerned. We hope that we will not be accused of being elitist. It is simply that in making the choice of whether to change the nature of the journal in order to cater to the popular 'tastes' or retaining our 'character', we chose the latter. One must aspire to do those things one is familiar with, after all.

With this decision also comes the change in format: from a monthly to a quarterly. This reflects the desire on our par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tandard of the journal as well as its financial base. Whether this will prove **successful** or not remains to be seen.

All this is by way of explanation on the first issue of the quarterly in a round about way, **somewhat**.

AN ANNOUNCEMENT TO OUR READERS:

WHAT CAN you do about

Since the Crossroads magazine came into being in January this year we have received encouragement, advice, and enquiries from various sources. To all those readers who have expressed their concern and support is due our heart-felt thanks. They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boosting our spirits through times of difficulty arising from the lack of both finance and manpower. We have now decided to continue our work despite foreseeable hardships. However, in order to avoid excessive strain we will publish on a quarterly basis. Your understanding and continued support is greatly appreciated.

The editors.

on the education crisis



EXPERIENCE

In Grade One, mother tried to put me in a prestigious elementary school. I was interviewed and rejected. In Grade Three mother made another futile attempt. And when I was positioned 33rd in a class of 40 in the terminal examination mother was mad at me and warned that if I did not get better results I would be in no position to compete successfully with more than 10,000 students for entrance into secondary school, which was an ordeal I was going to face in three years. It turned out that her prediction was correct. At the end of Grade Six I was positioned 8888 among more than 13,000 candidate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Entrance Examination. I was barely allocated to a technical school. Father said technical school was no good, and mother strived persistently to have me apply for the few good grammar schools which offered a few openings for competition in school-administered examinations. They also hired a private tutor for me, and somehow I got into a fairly prestigious school, to everybody's surprise!

Realizing how fortunate I was to be in one of the top schools I readily turned into a "good" student, giving up much of the adventurous ways that I was used to. My academic results showed steady progress over the years. Among my peers most were diligent workers, trying hard to get ahead of others or at least "keeping place". A few brighter ones managed to do just as well in non-academic pursuits, but they were truly rarities. Some were poor academically, but they were retained in the school for their good performance in sports, and they helped boost up the image of our school. Others were steadily getting wiped out.

It was a common sight in our school that students spent their recess time and other off-class hours studying in the school yard. I used to be one of them. I remember walking and reading in the field, I occasionally came across some grasshoppers, many of them transparently green in their youth. And I would look at them and admire how free they were in their natural environment.

For many, surviving or getting ahead in the system was a matter of getting smart. That did not necessarily mean overt cheating. That meant obtaining tips from those teachers who felt inclined to do so, learning to write correct answers without knowing why, or writing numbers illegibly or ambiguously to beat a chance, and a host of other means. A crucial ability was to screen out from the syllabus material which was unlikely to come out in the examinations. This obviously called for a skill at guessing, and often even courage.

At Form 4, (equivalent to Grade 10 here) I chose to enter the science class in preference to the arts class. The prevalent attitude was that the arts classes were inferior. Those who were academically in the position to choose mostly chose science. The poorer students were often left with no choice but going to the arts classes.

The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 at the end of Form 5 resulted in a large number of "drop-outs". Many of those who could afford it went abroad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for competition was less keen there. Two years later the 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 eliminated still more students. Still more went abroad. Quite a few took a second, even a third chance at entering university, and of course most of them failed. One of my friends who showed great potential, however, silently dropped out even without sitting for the matriculation examination. In a recent letter he explained to me: "I really can't say exactly why I came out so early to work. Of cours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could be one of the reasons. But the truly significant factor which made me decide to discontinue my studies was probably my sudden loss of interest in academic pursuits. I believed at that time that the syllabuses and examination system not only imposed an unnecessary strain on the student but severely restricted his freedom and creativity in learning. I believed that the learning process began quite early in childhood when one had still not reached the age to go to school, that one learned just as much from his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elsewhere, and that even upon graduation from university, the learning process continue. In fact, it was only the beginning of a lifetime of learning. Alas, it was youthful reveries that had driven me out of school at such an early age. I was the person who indulged himself too excessively in the passionate desire to follow one's calling - the hard calling of the arts with extravagant hopes.

It was the arrogance of youth that had made me throw away the dross of life, namely, bits of honour, a little power in the executive suite, a substantial pay, and material comforts. All these things reduced a man and deprived him of the ability to see..."

SUCCESS,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His view is, of course, not representative, and I doubt if a "representative view" can be drawn. The system in which we all grow up is a highly competitive one, and "success" has come to be interpreted in certain definite ways. It is: to rise above the crowds in material life, in prestige, and even in manners. It is clear that interpreted in this way one's success must mean someone else's failure. The system rewards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ability to live with or beat the system, not according to how much each contributes to the welfare of the whole. Given this system, it is natural that those who can take advantage of it will give it acclamation; those who are disadvantaged are disgruntled with it; others who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criteria of success are indignant.

It is easy to see that a system like this is not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whole community. For inherent in the system is a kind of human relationships which contribute to conflict and social unrest. These relationships, further, make it very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system.

I shall argue that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educational crisis, and indeed most of the "crises" that modern society faces.

WORLD CRISIS IN EDUCATION

In October 1967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World Crisis in Education" was held in Williamsburg, Virginia. 150 educational leaders from 52 countries attended this conference. At the conference the chairman, summarizing the discussion, said,

"...there is indeed a crisis in education's ability to match performance with expectations. The crisis takes two forms. The first is the world-wide disparity between the hopes of individuals and needs of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he second is an even greater disparity betwee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faced with the cruel restraints of grossly inadequate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are increasingly preoccupied with their own internal needs." These lines described some facts, but missed the essence of the crisis.

First, the described disparity between the hopes individuals and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will never disappear, and may even aggravate, if the educ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is not accorded a rightful place in the educational curriculum and outside the school. The majority of individuals want "success" and try to achieve "success" through education. Giv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uccess as rising above the crowds, it is obvious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society allocates its re-

sources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it is never going to satisfy most people. Universal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even universal university education, will never close the described disparity. A country as rich as Canada and a country as poor as India suffer the same problem of surplus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dia as well as Canada knows that it is not going to use the skills that many graduates have learnt in the university. Given the attractiveness of certain professions and given the fact that university education is often the stepping stone to enter these professions, many students buy university education much like people buy lottery tickets, with very little realistic assessment of the possible career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when buying education each may think that he can do better than others by working a little harder or that he is brighter than others.

As a result of the massive demands for the chance to get to the top, political pressure is generated to satisfy these demands, even though these demands may have little relevance to the true needs of society.

The only way to dissolve the crisis then is to change the meaning of success, so that success becomes reachable for each individual who tries. Stop artificially maintain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any profession. Reward each according to the contribution that he makes toward the welfare of society. This may often be achieved through relying on the forces of supply and demand acting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vested interests.

Education should encourage the view that success is measured by doing the best within one's ability in any given environment, in the endeavour of one's choice. A major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 is in developing a respect toward other people and self-respect. This is necessary for combatting prejudice and facilitating communication. With human relationships thus improved, what is there to prevent us from living a happier and more peaceful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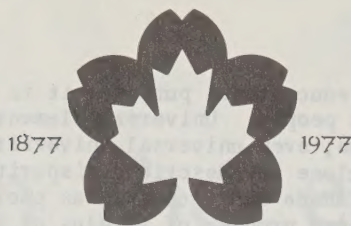
TOMORROW SAVE THE CHILDREN

"Children will be masters of the world tomorrow," as a familiar Chinese saying go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imple truth should not be difficult to realize. Why, in fifty years time they will have replaced almost all the decision makers of today. Bad decision makers today eventually will have to give way to the peopl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Children thus represent the hope of humanity. If our lifespan is too short for us to see where humanity is heading we can at least obtain a glimpse of it through the children of today.

It is therefore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to shape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our children inherit the mistakes we make today, especially the tendencies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s.



By Susan Hidaka & George Yamada

For some 40,000 Canadians of Japanese origin, the year 1977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It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landing and settlement of the first Japanese immigrant to Canada.

Little did Manzo Nagano, the itinerant stowaway on a British sailing ship from Yokohama in 1877 realize that when he stepped off in Victoria he would be recognized as the first Japanese to settle in Canada.

Throughout this year, Japanese Canadians across the nation, from tiny hamlet to major urban centre, will pause to reflect on this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Canadian history. Though few in number compared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Japanese Canadians take pride in their accomplishments. As Prime Minister Trudeau stated in Tokyo in October, 1976 "...Their contribution to Canada is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ir numbers."

Although enjoying relative success today, life for Japanese Canadians has not been without hardship. Branded the 'Yellow Peril', they faced discrimination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immigration. The bombing of Pearl Harbor was the beginning of a dark period for Canadians of Japanese descent. Wartime hysteria and fear fanned by economic rivalry and traditional west coast racist hostility moved the government of Mackenzie King, in violation of civil rights, to implement the War Measures Act, "legalizing" the mass removal of some 22,000 persons of Japanese origin living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British Columbia to inland deserted mining towns and road camps. Losses from property confiscation and exploitation was staggering and the psychological scars inflicted were in many cases deep and lasting. Despite the loss of most of their possessions, they managed to start over again. Some remained in concentration camps during most of the war years before resettling in hinterland Canada.

The dark period of history is over and Japanese Canadians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with optimism. During Centennial year, Japanese Canadians seek to make all Canadians aware of their cultural contributions to the national community. This is the year for Japanese Canadians to rejoice. Saturday, May 14, was designated as Centennial Day in communities across Canada. Japanese Canadians conducted dedication services and held Centennial dinners attended by government and civic authorities. In continuous celebra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wherever there is a large concentration of Japanese Canadians, displays and demonstrations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will be staged from the martial arts to the more gentle sumi-e or brush painting. And colourful kimono-clad young odori

dancers will be presented in well-choreographed concerts in the larger centres from coast to coast.

Recording 100 years of the Japanese presence in Canada, the Centennial historical photographic exhibition opened in the national capital, Ottawa, on May 16 at the Museum of Man and will tour the major cities of Canada. A twin showing will take place in Japan. In the more populous centres, Japanese Canadians will present commemorative gifts to their communities. Japanese Canadians of the province of Ontario, for example, will donate a huge temple bell cast in Japan bearing the inscription "Japanese Canadian Centennial 1977" for permanent display at Ontario Place housed in a traditional Japanese structure.

The Japanese Canadian Centennial places large emphasis on honouring the Issei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venturesome pioneering initiative as first Japanese residents in Canada, the homeland for their children. Almost every city and town with a sizeable Japanese population has organized its Keiro-kai Day to pay honour and respect to these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During the Centennial, Japanese Canadians will also seek to examine their identity as an ethnic group, an identity formed by the fusion of their ancestral heritage and their Canadian experience. Their place in the multicultural fabric of Canada will be symbolized by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multi-ethnic festivals staged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Japanese Canadians of Ontario, for instance, sponsored "Heritage Day" on May 29 at Toronto's Harbourfront where they shared a festive spirit with four other ethnic groups: Ukrainians, Finns, Blacks and Pakistanis. An all-day program included a Children's dance/theatre workshop, a multicultural panel/workshop with spokespersons of each group relating the history and experiences of their group in Canada, and an ethnic supper during which each group sold its typical food. The celebration was climaxed by multicultural entertainment in the evening. Midway in the entertainment period, Guest of Honour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rew Brewin was presented with an appreciative remembrance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cause of civil rights of all peoples, including Japanese Canadians whom he defended during the late war and postwar years. Harsh restrictive legislation, an outgrowth of the War Measures Act, sought at that time to deport Japanese Canadians.

As part of Canadian history the Centennial seeks to make all of Canada aware that "Japanese Canadians look forward optimistically to their second century,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fulfilling the promise of Canada's great future."

CHINA AND CHRISTIANS

加 中 友 谊

CROSSROADS: What are some of the programs through the Council introduce China to the Canadian public?

WHITEHEAD : We have developed a regular format and we call it China Consultation. First we ask a group of local churches of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to provide a setting and an audience for an evening program. Usually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ome varies from 40 - 80 people, and the program is done in various parts of Toronto and sometimes outside Toronto.

What happen is a room is set up with Chinese poster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walls, Chinese music in the background, and a display of Chinese books. This sets up the atmosphere. The program usually starts around 5:30 p.m. and a catered Chinese meal is served around 6:00 p.m. The meal sets a more relaxing atmosphere for the entire evening. Then a slide presentation on China today usually provided by someone who has recently visited China. After that, the format of the presentation varies. Usually discussion groups are formed to bring out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the slides on China.

During the discussion we try to inquire about what are the issues which bother the participants. We find that China is a very emotional topic for some people; the ones who feel negatively about China do not usually come to the consultation program. If they come, they bring along their negative feelings about such questions as freedom, the church, spiritual life and violence in China. There is a range of emotions and feelings about China. The main purpose of these consultation classes is to deal with these feelings seriously and to indicate the problem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se views and where they are from.

As a follow-up to the program, we send letters to people who attended meetings urging them to continue reading about China. Usually a package of articles about China from Christian perspectives is enclosed with the letter. We encourage them to become associate members of the program and to attend meetings regularly.

CROSSROADS: Why is it important to introduce China to the church community and to the Canadian society?

WHITEHEAD : The importance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former China missionaries in the church community. In fact, they provide the support and the interest for the program. On the other hand, even though China constitutes one fourth of the world, the church has no direct contact with China. This is because the churches in China have not been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work for 25 years. For these reasons, we feel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a special program to understand this quarter of mankind.

China is considered as significant because more than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size of population is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its impact. The revolution influences people's thinking all over the world. It also presents a major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European Marxism and to the general approach of the churches in dealing with problems. There is a need to understand revolution and its impact. We should try to learn from revolution in order to relate to it in the future. There is something of importance happening in China and we should try to understand it for our own benefits. We should

try to find out how China is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health, education, environment or such things as leadership training. There is a whole range of things and areas in which China is making exciting advances.

CROSSROADS: Does China provide an example then, or a tool for the church to reach out to the society here in terms of the christian ideal?

STANTON : China does not provide an example, but rather a challenge and a mirror. By looking at China and the approac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taking, christians can learn many informative points when attempting to deal with similiar problems. China is a mirror for Canada. By viewing China, we can understand our own ways of responding to problems better.

WHITEHEAD : In talking about China with a Canadian audience, we are not saying that we should follow China's way. China does present an alternative that we can learn from. However, we have to find our own solutions to our problems. People often resent being told to find answ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our own problems - and they are right in resenting it.

CROSSROADS: I am sure you are aware of the whole set of problems when dealing with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and missionary work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missionaries being agents of Western imperialism is still fresh in many of the 3rd world countries. How do you relate modern missionary work with the Western military and economic domination of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STANTON : I would say tha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missionary movements and Western military and economic domin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In fact, European christians were taking the gospels over-seas at the same time when Europe was expanding econom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was part of the whole movement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overseas.

But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is not easy to analyze. For example, we cannot say that the missionaries went as ambassdors of Christ without a political role. It is impossible to avoid the fact that they had majo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wherever they went.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not say that the missionaries were simply decoys of imperialism. Their intention was to do one thing but they were imprisoned within their own European world which made many of them working unintentionally hand in hand wi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erialism.

WHITEHEAD : I think there is a need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tructures people work with and their personal motivations when critizizing missionary movements - which I think needs to be critized. The imperialistic implications of missionary movements are not recognized nearly enough. But what should be questioned are the structures - what are the underlying implications and how these structures interacted with government,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terest along the way. When looking at individual missionaries however, we should look at their motivations, some of which were good and others not so good. Some people feel that when talking about cultural imperialism, we are putting down the motives of some very good people who were willing to sacrifice themselves to confront diseases and hardships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to face otherwise - and not for any personal or monetary gains. On the other hand, a lot found a great deal of glory in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but it is difficult to ascertain which was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



But certainly many people who went out with all good motivations, who opposed unequal treaties,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other imperialistic ventures which were going on at that time were nevertheless structurally benefiting from these very same things to which they were opposed.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can see that individually they were not imperialistic but structurally they were involved in imperialism. And some were both individually and structurally imperialistic because some did not see any distinction between military, trade motivations and their religious motivations.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economic and colonial policies were all about and thought it was beneficial to create one world and people trading with one another. They did not see the exploitative dimension. They accepted a lot of things that they might not have accepted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 sight.

CROSSROADS: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effort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in relation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do you think that historically, the missionary effort in China had helped or retarded in any way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TON : Interesting that the missionaries themselves often say that they though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as a bad thing but really it did exactly what they were hoping to accomplish in their own work. When the missionaries first went to China which was then locked into the feudal system, their impact acted as a catalyst in breaking down the feudal structures, brought China new ideas. There was a new current of thought that came about in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Taiping was a good example, and also the reform movement, Sun and the entire democratic movement. Another missionary influence was the missionary schools in China which produced a group of well-trained, committed and idealistic Chinese intellectuals, some of whom later were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HITEHEAD : Of course you can look at the negative side of it too. When it became a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99% of the missionaries opposed and functioned to retard the revolution.

STANTON : By this time they had staked their hope for better or worse on the Kuomintang and Chiang Kai-shek. On the other hand, the C.C.P. was opposed to any form of progressive alliance - especially during the Kiangsi period -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religious people in a united front.

CROSSROADS: What is the attitude and policy of the present Chines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churches in China?

STANTON : Legally speaking, the policy is toleration without support. The 1975 Chinese Constitution mentioned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s, freedom of non-belief, freedom to practice non-belief and propagate atheism. So it could be seen as a toleration of the hold of old society.

CROSSROADS: Can you estimate as to how large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s in China?

WHITEHEAD : Estimation varies. At the time of Liberation in 1949, the figure 5 million was given - I think optimistically. When I was in China in 1973, the official figure given me was 3 million -- 2 million Roman Catholics and 1 million Protestants. Still I doubt there are that many though.

I should add that historically, christians were identified with Western Imperialism, therefore one of their tasks in China today is to establish their loyalty to the nation and show that they are both christians and Chinese - not an easy job. In the future, unless the church in China can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hen christian groups can visit back and forth, when there are some comments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questions by the church, some criticism on what is taking place, unless there is a lively interchange or publication of its own journal etc, many people will not accept that as having religious freedom. But I think it is difficult to expect all this in the near future. We recognize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churches in China is not a top priority problem since there are so many other problems China is dealing with at present.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churches are China's business.

CROSSROADS: Is there a synthesis between socialism -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In what respect does Marxism contribute new insight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conversely, does the christian faith pose some questions for the Marxian practice in China?

WHITEHEAD : There are as many different brands of Marxism as there are of christianity though a general statement could be made: there is a christian - Marxist dialogue t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oday. Although we cannot go into all the theoretical, the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related to this Marxist - Christian dialogue, nevertheless there are 2 major areas of concern that could be mentioned. There is the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concerning for instance, the concept of the universe, what is the process governing the movement of things, and the nature of man and society etc. Since European Marxism and christianity both operate within a similar cultural heritage, discussion on these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is not difficult. Whereas the area most difficult in establishing a dialogue and yet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method of organizing society; how to deal with the poor, how to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 and how society is structured.

Now many intellectuals in the West look at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y say Marxism has been a failure. This is when China comes in. We ask: why is Chinese Marxism different? Is this 'real' Marxism, more pure or did the other get corrupted? Is it a synthesis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Maoism in what we call Marxism? But regardless of people's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e assessment

of what is happening there. China is interesting to many people because they see that there are something important and positive taking place there - a break through in terms of human organization.

If the Chinese can provide health care adequately for all, handle problems of pollution well, no problem of alcoholism, inflation, unemployment, then we have to ask: what's behind all these? What makes this society tick? There are no longer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but become essential, existential questions. This is when a lot of irrational emotions arise. Many people do not want to deal with China and underneath that I suspect it is because they sense that they have to deal with and face something that challenges their own values. So many people respond by using an emotional cover up by saying that there is too much violence, control and so on. If something good is happening in China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Church, Christianity and the West, then they ask, what does that leave us? Something that is good which did not come out of London and Washington? In many ways, this is a threat to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superiority of the West.

CROSSROADS: If one views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as a sociological phenomenon, as a form of mass movement and an expression of social change, then the questions of ultimate goals and immediate practical concerns become important. Are there points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in terms of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of social change?

WHITEHEAD : This depends on the context we are looking at. In places such as Latin America, Asia, there is an automatic coming together of christians and Marxists on a common struggle. For many christians, the only point now is to struggle against oppression - the th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can be solved later. And in a sense they are right, even from a basic christian perspective. For unless we as christians participate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oppression, we are just on the side of the oppressors and there will be nothing left when it is all over. Unless you are willing to loose your life, you will never find it. The question is not how we could preserve the church, but rather how we could serve the people.

Even Marx and Engels saw the potential of religion being a revolutionary force in some circumstances. When someone asked why there was not a revolutionary party in the Roman Empire, Engels said that was what the church in fact was. Or take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for instance - the people who led the peasant uprising were themselves nurtured by the Reformation of Christianity. At that point in history, religion functioned as a revolutionary force.

CROSSROADS: There are undoubtedly many revolutionary aspects to christianity, but are there not conflicts when it is matched agains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a political program? How does the idea of universal brotherhood reconcile with the need of class struggle, resulting in one class overthrowing another through revolutionary violence in most cases?

WHITEHEAD :

Christian theology is only at the beginning of being able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though I think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m to be resolved are there. What does it mean when Marx said "the proletariat can only liberate itself when it liberates all mankind"? Marxism points to a society beyond the class struggle - a classless society. Personally I think what christianity has to learn at this point is that the vision of human brotherhood has to be seen as a vision of what can be in a society when the classes are overcome. Christians should not react against the class struggle because it is an attempt to overcome oppression and oppressive structures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the classless society.

As to the question of violence in the uneven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t has caused more violence than any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Violence has to be looked at through a specific contex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revolutionary and reactionary violence,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just and unjust use of violence.

In Africa for example, when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gave grants to support the liberation movements there, many christians responded negatively. They asked: "why use christian money to support violence?" Then the head of the All African Churches spoke at a conference I attended. He said, there are all these christians in England getting so upset (cause really there was a great reaction in London where there were letters to the editor in the London Times for over a year), what is it all about? If you go to the Kenya or Nairobi, he said, you will see big cathedrals there built by the British. And you will see a plaque on the wall which says "in memory of Captain Jones or what not - who lost his life in putting down the native uprising of 18xx"

谈中国
CHINA AND OURSELVES

NEWSLETTER OF THE CANADA CHINA PROGRAMME

Canadian Council of Churches
40 St. Clair East,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4T 1M9

editors: raymond l. whitehead
michael stainton

5 issues annually \$2
reduced rate for bulk orders

this newsletter seeks to report
events involving canada and
china, and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china informed by the
christian faith,

material published herein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presenting
policies of the canadian council
of churches, or other churches
or organizations which support
the canada china programme

The church has supported colonial violence all this time. But now the violence is directed at oppression and it threatens the security of those christians then they raise the question of violence. But they didn't raise the question when colonialism was establishing itself in Africa in the 19th century, when they could build their memorial cathedrals. In this sense, the church has often been hypocritical on the issue of violence because it had supporte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violence in the past. In fact theology will say "there is no society without force." There are always deviation to be controlled. Violence is built into many kind of social structure. Therefore, there is never a question of violence and non-violence but a question of which kind of violence. If violence could lead to more just situation for most of the people, then it is the just war theory - christians should be able to support a violent move if it reduces violence in the long run - which is always a risky move. Take the case of China for example, there a violent revolution brought to the end a century of mindless violence. So christians should be able to say that here is a violent revolution that leads to a reduction of violence and therefore is less violent in its total impact. So I think those are questions christians have to deal with which they have not clarified sufficiently to this point.

CROSSROADS :

One gets the impression that although there is a basis for a united front between the socialist and the christian programs, the ultimate 'goals' of christianity which emphasize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material world is not completely compatible with the socialist ideal of a classless society, is this view valid at all?

STAINTON :

Christianity supports the hope of Marxism to build a world of justice, to do away with classes and exploitation. This is the basic question of the reconciliation of man to man. But christianity goes one step beyond and says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man be reconciled with God. This is when christianity departs from Marxism and goes beyond Marxism.

WHITEHEAD :

Obviously, the important question is: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reconciled to God? What does the word reconcile mean and the word God mean? If you take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of the last two thousand year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two words have gone through many different changes. If you take a medieval christian, a 1st century, a 3rd century, and a 20th century christian and sit them down together. When they say man has to reconcile to God, do they mean the same thing? I think not. For thoughts and history develop, so the concept of God also changes over the years.

Christianity, both in structure and in its theology is changing - it being in a kind of process. And I see Marxism also as a process. I don't think everything Marx said in the 19th century would be adhered to unchanged in the 20th or the 21st century. The final outcome, it seems to me, is beyond us historically. We do not know what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will become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re is room for fresh ideas and openness. In terms of what is achievable in society, there has been periods of both optimism and pessimism in christianity. Sometimes christians are very pessimistic and say that nothing decent can be achieved in this world because of sin. Other times they say we are called to work towards the build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because they think the power of God is going to help us build a society of peace and justice on earth now. So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interpretation even with the same theological principles. I would say we don't have all the answers to all the questions. Marxism does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to all its own theoretical problems, nor do the christians. How christian and Marxist will look at each other in a hundred years will be very different from now. We should not look at the two systems as static structures. I think when Mao says Marxism is not a dogma but a tool, a weapon, a compass pointing to a certain direction, he was on the right track. Christians should have the same approach, but I think they often become dogmatic. I think that is bad christianity just as dogmatism is bad Marxism. I think the future is open as to how christian and Marxist minds will relate to each other.

Some people say that if we are going to have a dialogue with the Marxists we have to know where we stand A.B.C., otherwise we are just going to be wishy washy. I don't agree with that approach. I say that we should know where we stand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our history and our community as christians, but that is not final. We should not have any final stands - certainly not a dogmatic A.B.C. approach. If that is the case, I think it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ity and what christianity is all about.

END

POETRY

In Hunan

Roving swordsmen of rivers and lakes
Cast their shadows
On dry burnt grass
Their silver blades sparkle
As the moon's warmth
Brings solace in the night.

Toronto, September 22, 1977

by Ch'en Shan-chang

VICTORIA, B.C. 1943

by Ch'en Shan-chang

I was conceived
In the days of internment
Atop a Government Street Cafe
Where the grease oiled my brow
And the bodies reeked with sweat.
The cockroaches
Danced in the gloom of the night
Alongside the bed posts
Of my three aunts and six uncles.
The staircase to the second floor
Was a descent to another time
But all I knew was a world
Of black hair, tired eyes
And pidgin English.
That day came
When I could stumble
The thirty-two steps
From the second floor to hell;
I knew I was in White Canada.
The rubbie dubs, drunks, whores,
Bums, no-accounts, thieves;
Grandpa served them all,
Gave them credit,
An ear to their plight,
A place to puke,
A space to cool off,
A Chinaman's chance?
He gave everyone a chance
Even the blue-eyed punks
Who murdered Wing On.

London, April 27, 1977.

IN THESE LATE HOURS

F. Moy

where are the stars
suns and moons
when i am a pebble
in this sewer
of human degradation?

its probably unfair
to say i have never
been happy
here
in this emotional desert
sometimes
there are flowers
which bloom
without deep roots

where are the lovers
who moved mountains
when there are only shooting stars
and evanescent pleasures?

it is here
i resurrect a sadness
unbecoming
of youth
oftentimes
in stillness
i feast
the dead

I SAW A MAD MAN

F. Moy

i saw a mad man today
dark scarecrow of straggly
seaweed head
chin of a cactus growth
mumbling insane poetry

clad in three forlorn oily jackets
perrenial coat trailing
a forsaken statue on grimy streets
Dundas and Elizabeth

seasons to him unchanged moored to a constancy
moored to a constancy
perhaps a woman, mother, a wife?
who obviously no longer

singular in this moonscape of
General Motor
the plight of generations
like a half glimpsed image of derelict
receding in the back mirror

There is, says this writer,
a will and a need for
this country to stay white

Doug Collins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Canadian Mosaic

BY LOK HO

There is a will and a need for this country to stay white, so says Doug Collins of the Weekend Magazine.*

Why? "The people of Canada do not wish to make a fundamental alteration in the character of their population." Collins cited Mackenzie King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in his essay, and quoted Richard Tait, chairman of the Canadian im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study, to conclude it. "In 100 years' time, I don't expect people will care all that much whether we legalized marijuana or not. But the decisions about who you let into Canada now will decide the kind of country we have then."

To support his urge, Collins said that racial tension was building up in Canada; that because of the influx of coloured immigrants, the Anglo-Canadian was facing increasing pressure to give up his values and his cultural position; that Canada might not comfortably absorb the new immigrants from "untraditional sources". Indeed, he said that existing immigration policy was too liberal so that "the world is to be stuffed down Canada's throat, whether we choke on it or not."

The balance of his essay consists of accounts of how immigration has been tipped toward more and more coloured immigrants since 1967, and how certain countries, like Holland, France, and Britain, face racial problems because of former liberal immigration policies.

Collins very appropriately titled his essay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Canadian Mosaic". This fear is real. However, what is feared is not real. The problem has to do with the fear. But what is feared is only imaginary.

First of all, the immigration of coloured people into Canada had started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They have, since then, proved themselves to be ready and able to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have indeed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untry. For example, th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which was instru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much virgin land was completed with Chinese labour under very harsh conditions. The Chinese people, like most other coloured immigrants, were peace-loving and did not create trouble. But trouble was created for them by "Canadians" who "feared" for no rational or legitimate reasons. For example, as early as 1878, a white workers' group in British Columbia was organized to oppose Chinese immigration. Calling itself the Victoria Workingmen's Protective Association, it declared that its intention was to strive for the mutual prote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of B.C. against the influx of Chinese labourers. Next year, Amor de Cosmos presented a petition to the House of

Common signed by 1500 British Columbians demanding an end to 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on the Pacific Railway Project. A committee was appointed with de Cosmos as the chairperson. Fortunately for Canada, their principal recommendations were reject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ich anticipated that the use of Chinese labour was essential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railroad.

It is clear that either of two kinds of fear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se historical events. The fear of the prospect of having to live with more and more people of a different race is irrational. The fear of the legitimate competition from coloured immigrants is illegitimate. Responsible Canadian citizens who are mature in thinking should at least strive to free themselves of both kinds of fear.

What is most dangerous, moreover, is the wide publication of articles expressing irrational fear. It is well known that irrational fear is often induced and can be easily reinforced. The consequence therefore can be easily expected when Collins cried out in alarm in a major magazine, "Between 1945 and 1967, a span of 23 years, non-white immigrants entering Canada numbered about 142,000. Between 1968 and 1975, at least 405,000 non-whites were granted entry, an increase of about 185 percent over the total for almost the whole previous quarter century." Again,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countries like India, Jamaica, Guyana, Hong Kong, the Philippines and, most recently, South Korea, have replaced France, Germany, and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list of the 'top 10' sending immigrants to Canada." If historically coloured immigrants have never caused trouble more than white immigrants, and when statistics in actual fact shows that immigrants are less prone to criminal activities, what is there to fear?

The expression that the Anglo-Canadian may have to give up his values in face of coloured immigration again is groundless. Nobody in this country is under any pressure to adopt any value system other than his choice. This is what Canada stands for. It is of course likely that, exposed to more people of a different background, one's values or outlook may change. But this is as natural as mental growth; indeed it is an aspect of mental growth. If one fears growth because he is scared of change, he can only be mentally retarded.

We must accept and recognize our history. The contribution of coloured immigrants, like that of white immigrants, cannot be denied. In spite of views espousing the contrary, Canada is a multi-cultural country, which indeed is what immigration and human rights add up to. If Canada were not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it might forever be Anglo-Saxon --- or rather, native Indian or Inuit. If Canada did not respect human rights, again it might forever be Anglo-Saxon, or Bicultural (with French) --- and then even the Red Indians would be second class citizens. But Canada is a land cultivated and nourished by immigrants of many lands and a land respecting human rights. Then Canada must not be half-hearted in living up to this dual character.

* Sept. 11, 1976

Recognizing this fact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 easing racial tensions. White Canadians will then accept legitimate competition from coloured Canadians. We will all abide by the rules of the game. White Canadians will not create fear out of imagination. As long as we faithfully follow and support the rules of the game (human rights, fair competition, and all that) we will always have the rules of the game to fall back on. The danger is that some Canadians are able to pass as respectable and responsible citizens when they themselves do not follow the rules. Responsible members of the press and other media should recognize their heavy responsibility.

Whatever lying ahead of us, Canada shall still be a congenial country to live in if only we shall stand together for equal rights or justice throughout the end. It is easy and tempting for people to shun their responsibilities when problems arise. To blame the immigrant for congestion, inflation, or unemployment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Economic prosperity is derived from work. The emblem of the city of Toronto espouses to Industry, Intelligence, and Integrity. May the three "I's" prevail. When the average Canadian is willing to say "I am responsible," then Canada will thrive.

在經費困難及環境局限下，海外述林經過半年掙扎，維持了四期紀錄。在讀者支持及勉勵下，編輯全人已盡了最大努力。可是到了目前的地步，若照原來月刊形式繼續下去，須作的自我犧牲，實在超出了全人能負起的程度。從今期開始，海外述林以季刊形式出版，出版方針以“因地制宜”、“貴精不貴多”為主。

Bookroom

思雅
書舍

Sapere Aude

- HISTORY
- POLITICS
- LANGUAGES
- PHILOSOPHY
- LITERATURE
- CHINESE PRINTS
- CHINESE PAINTINGS .etc.

— MAIL ORDERS WELCOME —



205 DUNDAS ST
SUITE C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G 1C8
TEL: 598-0296

OPEN DAILY FROM 11:00 am to 8:00 pm

We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 Asian Books

談空尚石

BOARD OF EDITORS :

CHINESE SECTION :

Fong Chi-kau
Ho Lok San
Lee Wai-man
Chan Kam Cheong
D. Yao
Rex Chiu

ENGLISH SECTION :

Frank Moy
Ann Quon
Johnny Sam

CONTRIBUTING EDITOR :

PHOTOGRAPHERS :

William Y.T. Wong
Peter Chan

PRODUCTION THIS ISSUE :

Belinda Li,
Fong Chi-kau, Ho Lok San, Olivia Chau,
Nancy Tong, Patrick Chau, Lee Wai-man.